

《歐美研究》第四十一卷第二期 (民國一〇〇年六月), 393-463

©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http://euramerica.org>

論歐洲化課題之 各類研究取向及其限制

黃偉峰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11529 台北市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

E-mail: wfhuang@gate.sinica.edu.tw

摘要

歐洲化課題自一九九〇年代後期便逐漸成為歐洲研究之熱門課題。但「歐洲化」研究的核心爭議依然懸而未決。除了定義概念指涉不明外，因果關係亦尚未釐清。本文從方法論角度切入，檢視目前歐洲化研究中具代表性的研究取向，評估其概念假設、理論建構及經驗分析上的優勢和限制。本文發現既有「歐洲化」研究因著重國內體制與政策之變動，故有偏好新制度主義和比較政治學之嫌。在研究方法上則多採個案性質分析，和有限案例比較方法，鮮少採用量化統計方法去檢證大量經驗資料。然而，隨著案例增加及議題擴散，研究「歐洲化」當務之急則是在實證上釐清其因果關係。而歷史制度主義及動態功能整合模型非常適合被用來分析歐洲化的因果時序及互置現象。

關鍵詞：歐洲化、歐洲統合、新制度主義、比較方法、準實驗設計

投稿日期：98.10.9；接受刊登日期：100.3.9；最後修訂日期：100.4.13

責任校對：賴怡欣、胡貴鳳、汪盈貝

壹、前言

「歐洲化」(Europeanization) 研究自一九九〇年代後期便逐漸成爲歐洲研究之熱門課題。然而「歐洲化」概念卻一向多所爭議。雖然如此，「歐洲化」常被廣義地定義成歐洲統合對會員國（或非會員國）國內之政治體系（或社經、法律和和文化體系）所造成之衝擊。舉凡任何國內法政、社經、文化、制度、意念和認同體系的改變（統稱國內體制），以及政策變動，若可歸因於歐洲統合之情事，皆是「歐洲化」研究之範疇。然而，隨著研究社群的擴大及研究議題的延伸，「歐洲化」除了由上而下 (top-down) 指涉歐洲統合對國內體制和政策衝擊外，它亦常被用來描述會員國水平間 (horizontal) 因歐洲統合所需之相互調適，甚至指涉歐洲（或歐盟）與國家層次間的互動過程 (interactive process)。換言之，會員國國內變遷亦會影響歐洲層次的治理空間 (governing space)。於是「歐洲化」概念從單向（由上而下）轉成雙向的因果關係。

除了「歐洲化」概念的指涉不堪明確外，學者對「歐洲化」概念如何測量仍無定論。即使「歐洲化」被界定成「歐洲統合對國內體制和政策之衝擊」，但對於衝擊 (impact) 本身這依變項的測量亦無一標準，更遑論測量何種政策和體制的變動真正來自歐洲統合。不僅學界對「歐洲化」的依變項如何測量有所爭議，而且對其自變項，即「歐洲統合」如何測量亦有歧見。例如，「歐洲統合」的外顯結果可以是歐盟的法規和政策產出，但也可能超越歐盟而指涉所有攸關歐洲認同、意念、習俗、環境等變遷對國內體制的直接或間接衝擊。換言之，「歐洲化」不等於「歐盟化」，儘管後者是一重要的指標。即使如此，對「歐盟化」概念的測量也有歧異。有些人主張直接測量歐盟的法規和指令在會員國內的執行 (implementation) 狀況；有人則主張測量歐盟與會員國政策是否趨合

(convergence)；亦有人認為應測量會員國治理體系的調適 (adaptation)。

針對「歐洲化」概念的測量有所歧異其實源自其理論建構的因果關係不明。雖說「歐洲化」指歐洲統合對國內體制和政策變動造成影響，但國內體制和政策變動不見得僅由歐洲統合所引起。這些變動可能更深層地源於內生 (endogenous) 的國內因素，亦可能來自外在的全球化或特定危機。在理論建構上，即使「歐洲化」是指「由上而下」，或「由布魯塞爾到各國首都」的壓力，但我們仍無法從國內體制和政策變動便直覺推論這是「歐洲化」所造成。研究者仍須排除其他內生因素及外在衝擊的另類解釋，才能釐清「歐洲化」的淨效果 (net effect)。此外，若我們將「歐洲化」界定成歐洲及國家層次的雙向互動過程，則在理論建構上我們必須能夠描述這個雙向互動過程，並設法釐清相關的中介變數 (mediating variables)。

實際上，「歐洲化」研究中所被提及的中介變數有些是為了挽救理論建構的缺陷。例如，國內行動者之意念、偏好和認知常被用來解釋為何同樣的「歐洲化」壓力 (如歐盟法規指令) 會造成同一國家不同時期，或不同國家同一時期的國內政策變動和調適。甚至，行動者的意念、偏好和認知也常被用來解釋會員國國內是否「感受」(perceive) 到來自歐洲統合的結構性壓力。又如各國改革的「機會之窗」(window of opportunity)、制度否決點 (veto points) 多寡、規範企業家 (norm entrepreneurs) 的存歿和政治動員 (political mobilization) 能量大小等，亦常被用來解釋為何歐洲化之壓力顯而易見，但各國國內體制和政策變動卻依然闕如。針對「歐洲化」衝擊的中介變數我們必須一一釐清，才能確認「歐洲化」衝擊的確存在。

儘管在概念的定義和測量，以及假設推演和理論建構上，「歐洲化」研究仍多所爭議，也存在許多缺失。但不可否認的是，「歐洲化」這個研究課題 (research agenda) 已漸成爲歐洲研究之主流。以「歐洲化」爲名的專書和研究論文更已達到「汗牛充棟」的地步。有鑑於此，本文針對日益龐雜的「歐洲化」研究做一有系統的整理，並從方法論的角度切入，探討這些「歐洲化」著作在概念的定義和測量、研究方法的設計、理論假設的建構及因果關係的推演上有何共同點及特殊之處，並進而找出「歐洲化」研究的新取向及其可能的侷限。

本文初步發現「歐洲化」研究從早期定義的爭辯和概念的釐清，逐漸有系統地衍生假設和建構理論。在研究內容上歐洲化研究亦從抽象的理論爭議，轉向實證案例的分析和比較。研究方法上，歐洲化研究從早期的個案研究，轉而使用比較方法，尋求有限案例的比較分析，來解釋「歐洲化」的衝擊。截至目前，「歐洲化」研究仍多採用質性研究的「縝密敘述」(thick description) 去解釋相關個案。絕少研究採用量化統計方法去檢證大量案例，並控制相關中介因素，以釐清「歐洲化」的淨效果。然而隨著研究方法的創新和經驗資料的大量累積，「歐洲化」研究的新趨勢已逐漸擺脫概念和理論的爭議，進而運用嚴謹的比較方法和使用大量實證資料去檢證理論模型和假設。於是釐清因果關係便成爲歐洲化研究的主要任務。換言之，「歐洲化」的研究課題已不再是「歐洲化」是否存在，或何種體制和政策被「歐洲化」。其新的研究課題旨在探討何種條件下「歐洲化」衝擊到國內體制與政策？這個新課題迫使「歐洲化」研究必須使用橫跨階層 (cross-sectional) 和橫跨時間 (cross-temporal) 的大量經驗資料去釐清「歐洲化」的因果關係。在此歐洲化研究的新趨勢下，唯一不變的是「歐洲化」研究必然是比

較性研究，其比較範疇必然涉及不同時間與空間背景的體制和政策變動。

本文共分五節。除前言外，第二節探討「歐洲化」的定義及其研究範疇。第三節討論「歐洲化」的概念測量及研究設計。第四節釐清「歐洲化」的理論建構及因果關係推演。第五節將現有「歐洲化」研究取向與過去歐盟理論連結，探討其新鮮之處為何，並據此暫做結論。

貳、「歐洲化」的定義及其研究範疇

針對「歐洲化」的定義學界已爭辯許久。簡單白話地說，所謂「歐洲化」就是「愈來愈像歐洲」(becoming more like Europe)。¹ 到底什麼「愈來愈像歐洲」呢？依研究者旨趣而定，但一般是指歐洲國家的國內體制和政策「愈來愈像歐洲」。可是「像歐洲」的什麼呢？這個問題邏輯上預設了可以共同想像和描述的「歐洲」。問題是「歐洲」做為一個地理區域、文化概念，甚或政經實體到底應呈現何種面貌，則尚無一定論。於是目前學者研究「歐洲化」大多採用易於操作的定義，即「歐洲化」是指國內體制和政策為因應歐洲統合所做的調適過程 (adaptive process) (Graziano & Vink, 2007: 7)。依此定義，「歐洲化」研究包含「歐洲統合」所產生的一切後果，例如歐盟的制度建構和政策形成，或泛歐洲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法律和價值體系的形成等。若「歐洲統合」被視為一尚未完結的動態制度化過程 (Stone Sweet, Sandholtz, & Fligstein, 2001)，則此動態過程對會員國 (或非會員國) 國內體制所造成的調適壓力亦是「歐洲化」的研究範疇。雖然早期「歐洲統合」研究亦曾觸及

¹ 此簡單定義乃由匿名審查人提供。特此申謝。

它對民族國家 (nation-state) 存廢，或對會員國中央與地方政府權限增減之影響 (Hoffmann, 1966; Marks, Hooghe, & Blank, 1996; Moravcsik, 1994)，但「歐洲化」研究更著重國內體制和政策的變動和調適。

然而隨著統合面向不同，也會導致對國內體制和政策的不同影響。Knill 和 Lehmkuhl (1999) 便區分正向統合 (positive integration)、負向統合 (negative integration) 和框架統合 (framing integration)。他們指出正向統合旨在以歐洲 / 歐體層次法規取代各國國內法規，要求國內規範體制順從並履行歐體法規。於是歐洲正向統合對國內體制的衝擊是直接要求後者進行改變和調適。歐洲負向統合旨在去除各國國內法規 (如去除貿易障礙之規定)，但不頒布單一法規要求一體適用。此種負面統合主要影響國內的政治機會結構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如行動者之權力和資源。於是國內體制和政策的調適在於呈現國內行動者的權力和資源的重分配。此外，框架統合是指歐洲決策情境僅允許採用模糊或象徵性政策。於是其影響所及也僅止於改變行動者的信仰、利益或偏好的界定，尋求動員支持者以便進行國內改革。Knill 和 Lehmkuhl 研究指出不同的「歐洲化」機制 (mechanisms)，端視「歐洲統合」的性質而變 (Knill & Lehmkuhl, 2002)。

一、「歐洲化」的雙向定義

除了「歐洲統合」面向不同會造成「歐洲化」機制的差異外，「歐洲化」也曾被定義成「在歐洲層次出現 (emergence) 和發展 (development) 獨特的治理結構 (distinct structures of governance)」(Risse, Cowles, & Caporaso, 2001: 3)，或法理上移轉主權至歐盟層次 (de jur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 to the EU levels) (Lawton,

1999)。值得注意的是，依 Risse 和 Lawton 等人的定義，「歐洲化」的研究範疇已與傳統「歐洲統合」之研究範疇相互重疊，蓋因後者旨在研究歐洲國家如何分享共儲主權於歐洲層次，並形成一獨特的治理體系。因此「歐洲化」除了研究國內體制和政策調適外，亦可研究既有國內體制和政策如何塑造歐洲層次的獨特治理體系。誠如 Hérítier 所言，會員國常移植其政策至歐盟層次，以減少國內體制和政策調適的壓力 (Hérítier, 1995: 278)。於是「歐洲化」定義從單向，由上而下地探討歐洲統合對國內體制和政策之衝擊和調適，轉而研究歐洲與國家層次的雙向、垂直與水平互動。例如，公共政策的「歐洲化」是一雙向過程。一方面會員國透過談判將其政策偏好「上傳」(upload) 至歐盟；另一方面，又從歐盟政策選單中「下載」(download) 政策 (Bulmer & Burch, 2001)。不過，為了避免混淆，筆者認為我們在概念上仍應區分自變項，即歐洲統合，和依變項，即國內體制和政策之變動與調適。但在研究設計上，我們應時時警覺「歐洲化」的自變項和依變項可能互為因果。所以，單向、由上而下的「歐洲化」研究設計可能無法釐清「歐洲化」的淨效果和因果關係。

即使我們將「歐洲化」界定成歐洲統合與國內體制和政策之互動及調適，但其指涉面向仍相當廣泛。Olsen (2002) 發現「歐洲化」可以指涉：(1) 外在疆域的改變；(2) 在歐洲層次形成制度和治理體系；(3) 「歐洲」對國家和次國家治理體系的滲透；(4) 輸出歐洲獨特的政治和治理模式；(5) 統一歐洲的政治計畫。「歐洲化」除指涉多重面向外，它亦可被界定為「過程」(process) 而非「狀態」(state)。例如，Ladrech 將「歐洲化」界定成一種「漸進」的過程，旨在重新定位政治的方向和形態，使得歐盟的政治和經濟動態成為國內政治與決策的組織邏輯 (Ladrech, 1994: 69)。所謂「組織邏輯」

(organizational logic) 是指組織對外在環境變遷的調適過程。須知若「歐洲化」被視為調適過程，則概念上「歐洲化」不再是「有無」的問題，而是「程度」(degree) 的問題。因此我們不能因國內體制或政策沒有變動就斷定「歐洲化」不存在。調適過程可能尚未啓動變遷，或「不予變動」本身就是一種調適。於是各國的「歐洲化」只是程度大小的問題。

Ladrech 定義的缺陷是太狹窄地聚焦於政治決策的組織邏輯，而忽略行動者的認知和偏好，以及政治認同和意念所扮演的角色。有鑑於此，Radaelli 將「歐洲化」界定成：「攸關歐盟正式和非正式規則、程序、政策典範、行事風格、共同信仰和規範的建構 (construction)、擴散 (diffusion) 和制度化 (institutionalization) 之過程。這些規則、程序、典範、風格、信仰一開始時經由歐盟政策制定去界定與鞏固，之後則被納入國內論述、認同、政治結構和公共政策的邏輯當中」(Radaelli, 2003: 30)。這個定義強調政治行為變動的邏輯，因此涵蓋國內體制和政策如何內化、調適、和制度化歐盟治理體系。但此定義的缺點是完全聚焦於歐盟，而忽略歐盟之外的歐洲統合面向。因此 Radaelli 的定義可能被誤以為「歐洲化」與「歐盟化」(EU-ization) 乃同義詞。Wallace 認為兩概念應予以區隔，因為歐盟本身就是「歐洲化」的一項產物，而「歐洲化」較「歐盟」有更長的歷史及更寬廣的地理界限 (Wallace, 2000)。不過不可否認的是「歐盟化」乃「歐洲化」之最重要一面向。雖然 Radaelli 的「歐洲化」定義未能如「背景概念」(background concept) 般涵蓋所有相關面向，但它卻是一個可操作的「系統概念」(systematized concept)，使得研究者明確限制其研究範疇。

的確，研究者為了操作之便常採用較窄的「系統概念」來界定「歐洲化」。例如，歐盟政策的執行常被等同於國內政策之「歐洲

化」(Hennis, 2001: 830)。又「歐洲化」也被界定成國家行政系統 (national administration) 因歐盟規定所做的調適 (Knill, 2001)。此外，會員國對歐盟法規和指令的遵守履行 (compliance) 也被視為「歐洲化」(Panke, 2007)。又中、東歐新會員國在加入歐盟前，必須針對歐盟法 (acquis communautaire) 及政治條件 (political conditionality) 所做的調適亦被視為「歐洲化」(Glenn, 2004; Schimmelfennig & Sedelmeier, 2005)。在操作上，「歐洲化」曾被界定成歐盟與會員國間的政策移植 (policy transfer) (Bomberg & Peterson, 2000)，或指歐盟提供溝通和競爭場域使得會員國間彼此學習 (learning)，交互使用行政上最佳措施 (best practice) (Burch & Gomez, 2003; Jordan, Wurzel, Zito, & Brückner, 2003)。最後，「歐洲化」也被界定成一種論述框架 (discursive frame)，從政策辭令 (rhetoric) 到腳本 (narratives)，用以正當化國內措施 (Hay & Rosamond, 2002; Kallestrup, 2002)。以上針對「歐洲化」的系統概念雖易於研究操作，卻可能造成定義混淆。誠如 Radealli 和 Pasquier 所言，「雖然概念分析不能簡化成『歐洲化』的定義，但好的概念需要嚴謹的定義」(Radealli & Pasquier, 2007: 35)。從概念分析角度，他們指出「歐洲化」研究的幾項缺失。第一，多樣的系統概念使得「歐洲化」的研究範疇不斷擴大，於是任何研究主題都可能被說成「歐洲化」現象。第二，「歐洲化」概念很難被測量，因為它指涉一種調適「過程」而非狀態。除非此「過程」有被衡量的明確指標，而且能觀察一段較長的時間，否則研究者常會錯誤地以為國內體制或政策愈類似歐盟治理 / 歐洲統合所需，便推論「歐洲化」現象是存在的。殊不知國內體制或政策愈像「歐洲」，也可能與歐盟治理 / 歐洲統合全然無關 (Radealli & Pasquier, 2007: 39-42)。

二、什麼不是「歐洲化」？

有鑑於上述批評，也爲了避免「歐洲化」概念的過度延伸 (conceptual stretching) 使其可以代表任何現象，Radaelli (2000) 試圖區隔到底什麼現象不屬於「歐洲化」。首先，「歐洲化」不是「共歐化」(Europeification)。後者是指歐盟與會員國事實共享權力 (de facto sharing of power)。「歐洲化」不同於「歐盟化」，蓋因後者乃前者之一次集合。其次，「歐洲化」不表示「趨合」(convergence)，因爲「歐洲化」是一種過程，而「趨合」僅是「歐洲化」的一項，但非唯一項結果 (Radaelli, 2003: 33)。例如，交通政策的「歐洲化」並未使各國政策「趨合」(Héritier & Knill, 2001)。「歐洲化」也不是「調和化」(harmonization)。儘管前者鼓勵各國政策相互調和，但各國政策卻不一定得調和一致 (Montpetit, 2000: 590)。「調和化」通常指減少法規的多樣性，但「歐洲化」卻對法規多樣性問題持開放態度。當然，「歐洲化」不等於「歐洲統合」(或「政治統合」)，蓋因後者是前者的必要條件。沒有歐洲統合，便沒有「歐洲化」的現象。「歐洲化」可能只是歐洲統合的一個後果，它強調國內體制和政策因歐洲統合所做的調適過程。既然「歐洲化」是指涉一種「過程」，則「歐洲化」常被認爲是一種延續性 (continuum) 概念，而非「二分化」(dichotomy) 概念。它代表一種「程度」(degree)，而非全有或全無的現象。問題是若將「歐洲化」視爲延續性概念，則任何現象都可被認爲是某種程度的「歐洲化」。這就是 Sartori (1991) 所指出的「程度主義」(degreeism) 問題，即原本「類別差異」(difference in kind) 被程度差異所取代。爲了緩解 Sartori 所提出的「程度主義」問題以及概念過度延伸問題，筆者建議研究者應嚴格狹化地界定「歐洲化」，以操作性定義去限制其研究範疇，並建構因果指涉明確的概念化和操作化指標以供經驗觀察。

綜合以上針對「歐洲化」定義的討論及概念分析，筆者試圖為「歐洲化」下一定義：歐洲化是指國內體制和政策因應歐洲統合／歐盟治理所做的雙向互動調整過程。其具體研究範疇則由表 1 列出。表 1 旨在回答「什麼被歐洲化？」這核心問題。這個問題其實預設 (presume) 了一個可以明確描述的歐洲層次自變項，即「歐洲統合」或歐盟治理體系。因為「歐洲統合」之故，使得會員國（或非會員國）國內體制和政策必須有所改變或調適。而國內體制和政策便是被「歐洲化」的依變項。因為「歐洲化」可以是歐洲與國家層次的雙向互動過程，所以回答「什麼被歐洲化？」這問題不能遺漏其邏輯預設的自變項。這也是表 1 所述之「歐洲化」研究範疇與前人最大差異處。另一不同點是本文對「歐洲化」依變項的界定實超越國內政治體系所涵蓋的面向。除了「歐洲化」研究者慣常分析的對象，即國內政治體系，本文亦將社會、經濟、法律、文化、地理、生態、和環境等體系列入，用以容納非政治學門的「歐洲化」研究。雖然本文自始即將上述體系與政治系統稱「國內體制」，但為了明確指涉「什麼被歐洲化？」，筆者於表一詳列「國內體制」的細項。

三、「歐洲化」之研究範疇

如表 1 所示，被「歐洲化」的對象包括歐盟會員國或（非會員國）國內各項體系 (systems)。其中政治體系可細分為國內結構、公共政策、和認知暨規範架構。國內結構又可區分成政治結構（如組織制度、公共行政、府際關係和法律秩序）和社會分歧及代表性結構（如政黨、壓力團體和社會分歧的構成）。公共政策則包括行動者、政策問題、風格、工具及資源。至於認知與規範架構則包括論述、規範與價值、政治合法性、認同、國家治理傳統、政策典範、

表 1 「歐洲化」的研究範疇

歐洲層次：

國家層次：歐盟會員國（或非會員國）

<p>歐洲統合之動態產物</p> <p>如：歐洲自由貿易協會 (EFTA)、歐洲經濟區域 (EEA)、歐洲理事會 (Council of Europe)、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 (OSCE)、歐洲產業家圓桌 (European Round Table of Industrialists; ERT)、申根協定、歐洲區域大會 (Assembly of European Region; AER)、次區域合作機制 (如 Arge Alpe) 等</p>	<p>T₀</p> <p>T₁</p> <p>T₂</p>	<p>社會體系、地理體系、經濟體系、生態體系、法律體系、環境體系、文化體系等</p> <p>政治體系</p> <p>國內結構</p>
<p>歐盟治理體系</p> <p>※ 歐盟憲政體制及法律秩序</p> <p>※ 歐盟的超國組織運作</p> <p>※ 歐盟的公共政策</p> <p>※ 歐盟政策社群及網絡治理</p> <p>※ 歐盟的文化價值體系</p> <p>※ 歐洲認同及歐盟的民主赤字</p> <p>……</p>		<p>※ 政治結構</p> <p>(1) 制度與組織 (如內閣—國會關係)</p> <p>(2) 公共行政</p> <p>(3) 府際關係</p> <p>(4) 法律秩序</p> <p>※ 社會分歧及代表性架構</p> <p>(1) 政黨</p> <p>(2) 壓力團體</p> <p>(3) 社會分歧的構成</p> <p>※ 公共政策</p> <p>(1) 行動者</p> <p>(2) 政策問題</p> <p>(3) 政策風格</p> <p>(4) 政策工具</p> <p>(5) 政策資源</p> <p>※ 認知暨規範架構</p> <p>(1) 論述</p> <p>(2) 規範與價值</p> <p>(3) 政治合法性</p> <p>(4) 認同</p> <p>(5) 國家治理傳統</p> <p>(6) 政策典範、框架和角本</p>

資料來源：本表歐洲層次的內容乃筆者自行整理，國家層次內容則參考 Radaelli (2003: 35)，但亦加上社會體系、經濟體系……等，以求較周延寬廣之研究範疇。

框架和角本等。如果「歐洲化」被界定成單向，由上而下地對國家體制和政策的衝擊和調適過程，則表 1 左欄之項目便是「歐洲化」的研究對象。如果「歐洲化」涉及歐洲與國家層次的雙向互動過程，則我們的研究範疇應擴大至歐洲層次的變項，即歐洲統合或歐盟治理體系。若我們把歐洲統合視為仍在進行中的動態過程，則此動態過程下的暫時產物乃我們可以觀察得到的指標，也就是「歐洲化」的自變項（或解釋變項）。值得注意的是，表 1 所列出之歐洲統合的動態產物不僅包括歐盟治理體系，尚包括各種泛歐洲或次歐洲組織和合作機制，例如歐洲自由貿易協會、歐洲理事會、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歐洲產業家圓桌、申根協定、歐洲區域大會等。上述的歐洲合作機制雖伴隨歐洲統合歷史而來，但卻不見得完全被歐體或歐盟所吸納。它們對會員國的衝擊應可視為「歐洲化」的一種。當然歐盟治理體系對會員國（或非會員國）國內體制和政策的衝擊是「歐洲化」的標準案例，應殆無疑義。

此外，儘管「歐洲化」是歐洲與國家層次的雙向互動過程，但「歐洲化」主要的解釋對象（即依變項）仍是國內體制和政策。因此表 1 實線箭頭指向國家層次的變項，代表歐洲層次對國內所造成的衝擊乃「歐洲化」所欲解釋的主現象（Graziano & Vink, 2007: 8）。表 1 虛線箭頭指向歐洲層次變項，代表國內體制和政策之調適亦可能會影響到歐洲統合或歐盟治理體系的運作。不過這種「歐洲化」的反饋作用（feedback effect）並非其研究主旨。探討會員國如何建構歐盟治理體系，或如何分攤共儲主權乃「歐洲統合」的傳統研究範疇。只不過「歐洲化」因自變項和依變項可能互為因果，所以研究國內體制和政策的變動及調適不得不分析歐洲層次變項是否改變，然後再對國內體制和政策所造成的「次級衝擊」（second-order impact）。例如，在時點 T_0 ，某會員國受到歐盟法規指

令的調適壓力。而在 T_1 該國不但未做任何政策修正，反而成功地移植其原本政策偏好至歐盟而成爲各會員國遵循的準則。於是在 T_2 時點歐盟對會員國國內體制和政策造成了「次級衝擊」。須知「歐洲化」的「次級衝擊」仍是「歐洲化」的研究範疇。可惜的是，筆者發現學界前輩針對歐洲化「次級衝擊」的研究仍相當厥如，² 更遑論將歐洲化的「次級衝擊」予以理論化，並精確評估其淨效果。

參、「歐洲化」的概念測量與研究設計

研究「歐洲化」的衝擊（或次級衝擊）首先我們必須能夠測量「衝擊」（impact）這概念。從「歐洲化」定義，我們知道所謂「衝擊」之對象是指國內體制和政策，但反應在衝擊對象的外顯特徵則是其「變動」或「調適過程」。因爲「衝擊」概念本身無法直接觀察和測量，所以研究者只能退而求其次去觀察或測量可以指涉「衝擊」的概念化（conceptualized）指標（Babbie, 1979: 118-135）。換言之，觀察和測量國內體制與政策的「變動」（change）或精確描述其「調適過程」乃初步判斷「歐洲化」衝擊是否存在的必要手段。例如，在公共政策的「歐洲化」研究中，Radaelli 提出國內政策變動的四個方向，即減縮（retrenchment）、鈍化（inertia）、吸納（absorption）、和轉化（transformation）（Radaelli, 2003: 37-38）。又 Héritier 等人指出「歐洲化」可以被一個包含轉化、調整（adaptation）、鈍

² 不少研究在理論上雖觸及「歐洲化」的雙向互動過程，但卻未仔細演繹其因果假設，也未評估「歐洲化」的次級衝擊。例如常被引述的「歐洲化」經典著作 *Transforming Europe* 一書中的所有作者皆探討「歐洲化」的主要國內衝擊。雖然有些論文提到國內體制和政策對歐盟治理之影響，但這些文章並未評估歐盟治理體系對國內的次級衝擊。其主要目的乃是希望透過「追蹤過程」（process tracing）的方式去釐清「歐洲化」與其他內生中介變數或外在環境因素的影響。見 Cowles, Caporaso, & Risse (2001)。

化和減縮的量表所測量 (Héritier & Knill, 2001)。Lodge 也區隔「維繫體系」、「調整 / 部分重整」和「轉化」等三種變動樣態 (Lodge, 2002)。所謂「鈍化」是指缺乏改變，其形式可能是抗拒改變或延遲變動時程；「吸納」是指調整式的改變，一方面維持既有核心架構，另一方面做些微且必要的改變，以因應外在壓力；所謂「轉化」是指政策核心架構的改變及政治行為典範的變動。至於「減縮」則指不但抗拒改變，而且反其道而行，與預期變動方向悖離。儘管上述變動方向皆有清楚定義，但問題是我們如何區分「轉化」與「調整」的程度差異呢？³ 國內政策些微變動是要歸類至「鈍化」或「吸納」呢？換言之，上述四項政策變動的概念化指標，仍需透過操作化 (operationalized) 的指標才能被測量。

一、如何測量「歐洲化」之「衝擊」？

圖 1 針對歐洲化的「衝擊」區分概念、概念化指標及操作化指標，並舉例說明操作化指標的可能樣式。須知圖 1 並未窮盡所有歐洲化「衝擊」的操作化指標，也未針對特定國內體制或政策研擬操作化指標。有效的操作化指標應根據研究者的主題來設定。例如，若將「歐洲化」研究主題設定為各國履行歐盟法律的程度 (Panke, 2007)，則概念化上我們應區分各國履行歐盟法律的幾種可能狀態，即減縮、鈍化、吸納和轉化。接著我們必須就上述四項概念化指標設定可資觀察和測量的操作性指標。例如，國內是否立法去弱化或抵消歐盟法規和指令(減縮)？國內是否延遲履行歐盟法規和指令 (鈍化)？國內是否僅選擇性去執行歐盟法規指令，但未更動其

³ Héritier 和 Lodge 等學者並未明確界定「調整」(adaptation) 一詞。為了避免與「調適」一詞混淆，筆者在本文將「調適」廣義地界定為體制或政策變動的所有樣態。而「調整」則參考上述學者之原意指結構不變，僅枝節局部變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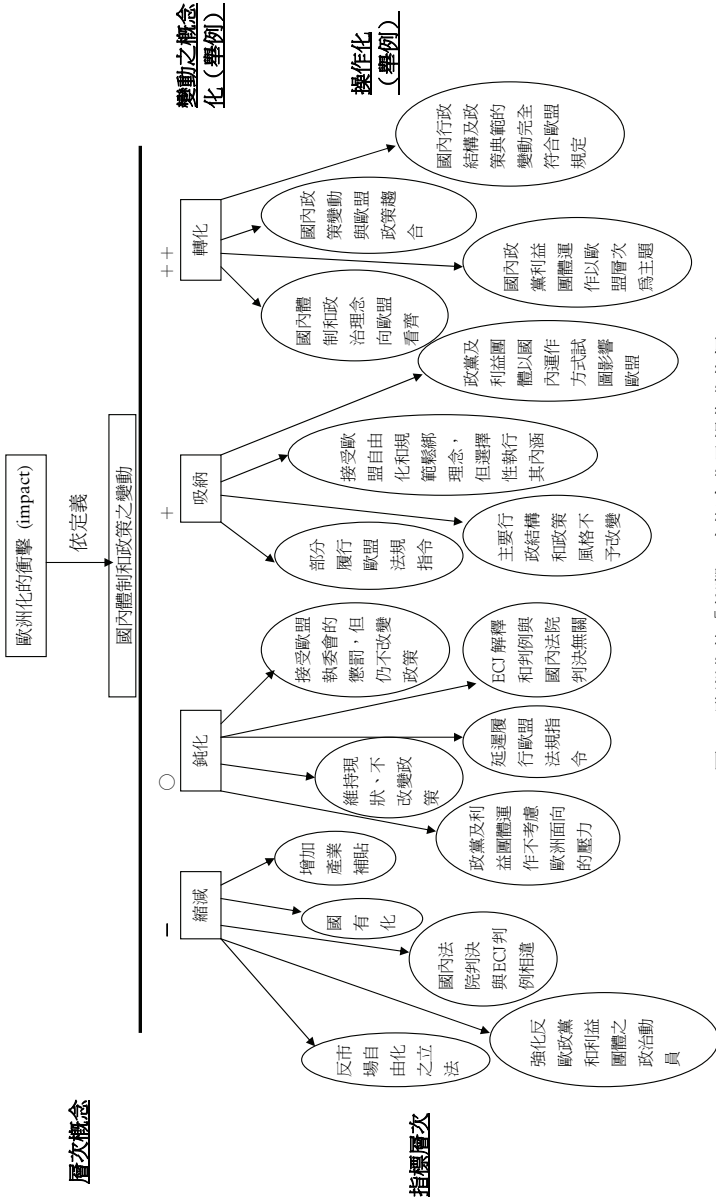


圖 1 歐洲化的「衝擊」之概念化及操作化指標

資料來源：筆者參考 Radaelli (2003: 37-38) 對「變動」的概念化指標，再自行依不同議題提出操作化指標。

根本的規範架構呢 (吸納)? 國內是否全面改變其法律規範架構來因應歐盟規定 (轉化)? 又若將「歐洲化」主題設定成各國是否順從歐盟市場自由化的政策方向, 則操作化指標可以包括國內是否有反市場自由化之立法 (減縮)? 國有化企業的數目和市占值是否維持不變 (鈍化)? 國內干預市場之法規雖有部分移除, 但整體規範架構是否並未改變 (吸納)? 國內市場是否完全遵照歐盟自由化法規來運作, 並排除所有結構性障礙 (轉化)?

爲了更精確測量, 研究者可以針對個別操作化指標設計量表來評估其「變動」的幅度。例如, Héritier 和 Knill (2001) 以運輸產業的歐洲化爲研究對象, 區隔大、中、小三種幅度的政策變動。他們將「大幅變動」界定爲針對「解決問題」(problem solving) 的意識形態及其政策工具的大轉變。在公路拖曳產業是指廢除准入市場的總量管制, 廢止行政稅捐及一切違反市場運作之障礙。在鐵路產業是指鐵路硬體的完全私有化, 鐵路網絡與服務業完全分離, 開放民營鐵路服務, 和終止政府補貼。所謂「中幅變動」是指部分私有化, 及鐵路營運私有化, 但鐵軌網絡仍屬國家所有。公路拖曳產業的「中幅變動」是指准入市場的總量管制與零稅捐同時並存。至於「小幅變動」是指市場機制運用極小化, 維持大部分政府干預工具 (Héritier & Knill, 2001: 259-260)。當然, 研究者所設計的變動量表及指標也必須具有測量概念的效度 (validity)。例如, 市場自由化的指標也許不是國有企業的有無, 而是企業的獨占性。因此, 國有企業的數目並非一具有效度的指標, 即它並不能有效測量「市場自由化」這概念。因而其所衍生的量表也不具效度。換言之, 圖 1 雖列出相當多的操作指標來測量國內體制和政策之「變動」, 但是研究者仍須合理化 (justify) 各該項指標之效度, 否則我們無法依指標所觀察到的現象來推論國內體制和政策是否或如何「變動」。

二、「調適過程」的兩種概念化

更嚴峻的挑戰來自對「調適過程」(adaptational process) 概念的測量。國內體制和政策的縮減、鈍化、吸納和轉化之任一形態皆可被稱做「調適過程」。四種變動形態的順序也可被視為「調適過程」。蓋因「過程」是一持續動態概念，而「調適過程」中的任一暫時結果皆不能窮盡「過程」這概念 (Hacking, 1999: 36-38)。於是，實證上不論國內體制與政策是否或如何變動（或不變動）皆可被視為「調適過程」，進而誤謬地推論「歐洲化」的效果是存在的。欲排除這種推論誤謬，我們必須能夠精確描述「調適過程」，並辨別何種「調適過程」與「歐洲化」無關。例如，Börzel 和 Risse (2003) 提出兩種概念化方式來描述「調適過程」。假設歐洲統合或歐盟治理體系對國內體制和政策造成調適壓力，則國內之「調適過程」可採兩種途徑，一是源自理性抉擇制度論；二是源自社會學 / 建構主義制度論 (Hall & Talyor, 1996; March & Olsen, 1998)。雖然兩種調適過程可能同時存在並行，但我們在概念上予以區隔以便討論。

如圖 2 所示，從理性抉擇制度論的觀點，一旦調適壓力形成，它為行動者創造新的機會和限制。如果既有體制內存有較少的否決點與較多的輔助性組織，則會引導國內資源的重新分配，於是主張改革和反改革的行動者被授予不同的能力，進而促成國內體制和政策的變動。相對的，若從社會學 / 建構主義制度論來看，歐洲統合的調適壓力來自其所產生的新規範、新意念及共同認知。透過規範企業家的鼓吹和非正式機構的合作與動員，國內行動者進行社會學習，歷經社會化，進而內化歐洲規範，產生新的認同，於是促成了國內體制和政策的變動。雖然上述兩種調適途徑不同，但最後經驗觀察指標仍是國內體制和政策的變動與否，例如是否發生吸納或轉化的現象？是否造成「趨合」或「趨異」(divergence) 現象？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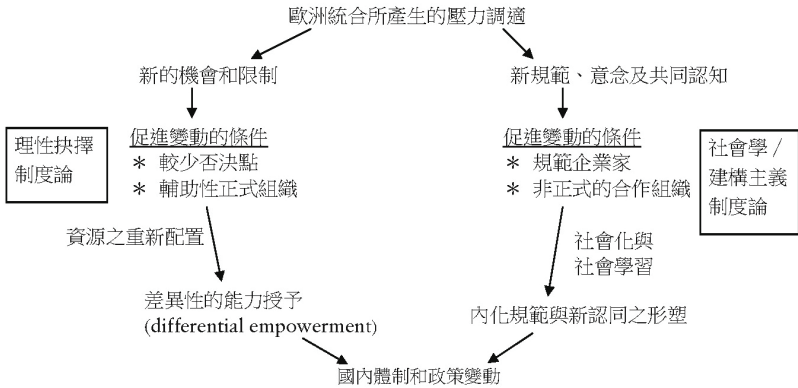


圖 2 「調適過程」之概念化

資料來源：引自 Börzel & Risse (2003: 69)，並標明兩大理論流派。

者不但要能辨識調適後的現象，還得縝密地敘述調適「過程」的因果關聯，透過「過程追蹤」(process tracing) 方式排除其他干擾因素。

舉例來說，在探討德國公屬銀行的國家擔保 (state guarantee) 制度如何受到歐盟競爭政策影響時，Grossman 首先闡述德國銀行產業現狀及傳統「三級銀行體系」(three tier system) 之共識決策 (consensual decision-making) 傳統；其次，他說明自一九八〇年代後信用合作社銀行 (cooperative-credit bank) 因失去賦稅優惠轉而尋求平等立足點，要求德國政府取消對公營行庫 (即邦屬銀行 Landesbank 和儲蓄銀行 Sparkassen) 的債信擔保。然而，因德國的共識決策體系，公私銀行的衝突尚能被控制。到了一九九〇年代初期，拜歐盟競爭政策之賜，德國境內銀行公會組織受執委會暗中鼓勵，逐漸向其告發德國銀行體系之不公平競爭情事 (如國家債信擔保制度)，執委會則依其職權啟動正式調查程序，進而向德國政府施壓。換言之，歐盟競爭政策授予德國民營銀行告發能力，提供對外申訴的機會之窗，於是在裡應外合之下，德國於二〇〇五年廢止

由國家提供公營行庫債信擔保制度 (Grossman, 2006)。

另一例子來自 Zahariadis (2005) 探討一九八九年「歐盟購併控制法規」(European Merger Control Regulation) 對英國購併政策之影響。Zahariadis 首先描述英國購併政策之歷史淵源，從一九七三年「公平交易法」(Fair Trading Act) 到一九九八年的「競爭法」，英國購併建制 (merger regime) 的基本原則是「購併是被允許的，除非政府證明其不可。」在此原則下，英國的公平交易署 (Office of Fair Trading; OFT) 根據多項衡量標準，例如：公司資產 (在一九九四年是 7,000 萬英鎊以上) 和公司的市場占有率 (25%以上) 等得對合併公司進行調查。准許合併被視為常態，除非 OFT 主任建議國務大臣 (Secretary of State) 進一步考慮是否駁回。換言之，英國購併政策旨在避免政府部門干預市場。因此，是否有違公平交易原則之舉證責任在於政府，而最後決定是否允許公司合併也是由國務大臣來做政治裁量。這套建制的缺失早為人詬病，但始終遲遲未做改變 (Zahariadis, 2005: 661-673)。

直到一九八九年歐盟購併控制法規生效後，英國的購併建制才逐漸與歐盟購併建制趨合。但歐盟的購併建制並不適用所有公司合併案例，而且該購併控制法規只區分管轄權，卻未見強制性規定。雖然歐盟購併建制與行之有年的英國購併政策之差異頗大，但因其無強制力，故英國並無義務去調整其購併建制。那麼為何英國要調整其購併政策呢？Zahariadis 發現一旦歐盟在公司購併領域建立政策權責，則其政策形象 (policy image) 便使其政策內涵具有合法性。尤其在高度複雜的公司購併領域，政策制定者通常無法專斷，反而常必須參照其他類似案例或其他專業組織的意見。因為歐盟規定不論是否具強制力皆常被指涉討論，形成焦點 (focal point)。因此，英國業務主管官員自然經常與歐盟競爭總署官員互動和互通訊

息，而歐陸與英國公司也經常互動，使得歐盟在購併領域的新想法和規定傳遞至英國的相關政策網絡。漸漸地，一方面英國政策網絡成員覺得本國購併政策不合時宜。另一方面，英國 OFT 官員經由社會化過程，逐漸內化歐盟購併建制的規範。因為決策者的價值偏好的改變，使得英國採取歐盟所訂定的標準來審議公司購併案例，也大幅減少政治裁量的空間 (Zahariadis, 2005: 660, 664)。

上兩實例雖然詳細描述了「歐洲化」下國內政策的「調適過程」，但在研究設計上皆屬個案分析，故甚難將其分析結果通則化。在德國案例中我們發現歐盟競爭政策的衝擊是透過創造機會之窗，結合德國民營銀行公會，重新分配資源，並授予控訴告發能力，使得德國政府不得不廢除其國家債信擔保制度。本案屬理性抉擇制度論所述之調適過程。在英國案例中，我們發現來自歐盟的調適壓力並不是其規定的強制性，而是透過政策形象來確立其內涵合法性，加上政策網絡成員的互動學習，社會化與內化歐盟規範，於是逐漸使得英國購併建制與歐盟規定相符。本案則屬社會學/建構主義制度論所述的「調適過程」。雖然兩個案例的「調適過程」之內在機制不同，但最後國內政策變動皆可明顯歸究於歐盟的政策運作。這種採「過程追蹤」及縝密敘述的個案分析的優點是可追溯不同時點國內體制和政策的現狀和變化，並控制相同時點的其他內生和外在因素，進而推論歐洲化之衝擊是否存在或程度大小。其缺點是個案分析結果往往無法通則化。而其所辨識之相關變數僅屬建議性質，仍待後續大規模案例的經驗研究加以否證。

三、「歐洲化」的研究設計：從「個案研究」到「比較分析」

爲了檢證個案分析中所發現的相關變數，絕大部分的歐洲化研

究皆使用有限案例的比較分析。特別是運用比較方法中的「最大差異系統」(most different system) 或「最大相似系統」(most similar system) 的研究設計，研究者盡量控制相關干擾變數，以評估主要解釋變數之影響力 (Przeworski & Teune, 1970)。易言之，研究者希望在異中尋同，或在同中尋異。例如，Knill (2001) 在探討國內行政體系如何調適來自歐盟環境政策之壓力時，便先採用「最大相似系統」的設計，審慎挑選英國和德國做為比較案例。他指出英國和德國乃兩個最相似案例，因為兩者之社經和政治條件極相似。例如兩者之經濟和工業發展程度、教育水平、人口密度、生活水準及社會福利等皆大致相似。又兩國皆是自由民主政體，其政黨和利益團體皆參與政策制定，而且兩國都具備先進且有效率的行政體系。在環保領域，英國及德國都面臨嚴峻的工業污染和交通擁擠問題，兩國都具有高度環保意識；其環保組織不但繁多，而且財力雄厚，動員能力強 (Knill, 2001: 52)。因此在所欲控制的相關干擾或背景因素上，英國和德國呈現最相似案例。可是在該研究的依變項上，即英國和德國的行政傳統、風格和結構，以及產業安排組成的制度，兩者卻呈現截然相反的樣態。的確，不論在行政和法律傳統，或在政治體系運作上 (如單一制 vs 聯邦制國家)，英國和德國常被視為兩類相反典範 (Dyson, 1980)。於是慎選比較案例後，Knill 不但可以控制其他干擾因素，而且可以運用「最大差異系統」的研究設計來探索相同的歐盟環境政策是否及如何衝擊英國和德國行政體系 (Knill, 2001: 53-55)。

嚴謹比較方法也被應用到分析各國政黨如何因應歐洲統合而調整其內部組織及權力分配。Carter, Luther 和 Poguntke (2007) 等人採用「最大差異系統」的設計，依加入歐盟日期、政府組成形態、領土集中程度、懷疑歐盟態度的深淺，及是否存在具有相當實力的

疑歐 (Eurosceptic) 政黨等比較指標，選擇了奧地利、英國、法國、德國、西班牙和瑞典等國共三十個政黨。這種設計企圖控制最大的跨國變異量 (cross-country variance)，並觀察歐洲統合是否造成這些政黨的組織重整和資源重分配，例如政黨是否改變組織章程，給予前任職歐盟的黨員參與黨中央行政決策？是否讓其熟悉歐盟事務的黨員運用黨的財源和人力？是否改變其歐洲議員選舉的提名規則？此外，Börzel (2002) 採用「最大相似系統」選擇地方分權程度相似的德國和西班牙來比較前者之邦 (Länder) 和後者之自治州 (Communidades Autonomas) 如何因應來自歐盟的挑戰。到底歐盟的共同區域政策使得邦和自治州更加獨立自主呢？或反而使其必須與該國中央政府合作呢？是否因為德國和西班牙的行政傳統不同而造成其採用相反策略來應付歐盟的調適壓力呢？

以上有限案例的比較研究雖然可以深入檢證「歐洲化」的相關解釋變數，但是卻因「相對解釋」(rival explanations) 數目往往多於可觀察的案例數目 (Lijphart, 1971: 686)，致使比較結果常無法充分否認「歐洲化」的「虛無假設」(null hypothesis)。有鑑於此，擴充比較案例數目便是合理的研究策略。通常研究「歐洲化」學者會先設定一「分析架構」(analytical framework) 來概念化和操作化歐洲統合或歐盟治理體系對各國國內體制和政策所造成的衝擊及其調適過程，然後再集結不同國家或不同政策領域的個案，依該「分析架構」來探討「歐洲化」現象，最後再由一學者（通常是專書主編）比較個案分析的結果，做出暫定結論。最典型的例子是 Cowles、Caporaso 和 Risse 在二〇〇一年出版的專書 *Transforming Europe* 提出的「歐洲化三步驟」(“three-step” approach) 分析架構，即從歐洲化過程到歐洲化與國內結構之契合程度 (goodness of fit) 所產生之調適壓力，經由中介制度和行動者之影響，於是產生國內

結構變動，其變動效果再反饋至歐洲化過程 (Risse, Cowles, & Caporaso, 2001: 6)。

三位專書主編接著要求章節撰寫人應用上述分析架構去探討歐盟性別平等政策對英法兩國之行政立法的影響 (Caporaso & Jupille, 2001)；歐盟運輸政策對英、德、義及荷蘭之公路拖曳和鐵路運輸政策之衝擊 (Héritier, 2001)；義大利如何回應歐盟經濟暨貨幣同盟 (EMU) 的趨合條件，而在其政府財政收支上有所變革 (Sbragia, 2001)；歐洲法院之「先行裁決」(preliminary ruling) 機制如何轉化英、法和德國之國內司法架構 (Conant, 2001)；英國和德國如何執行歐盟環保政策，即飲用水指令，環境資訊取得指令，環境影響評估指令，和環境管理和監視系統法規 (Knill & Lenschow, 2001)；歐盟共同區域政策如何改變德國和西班牙的中央與地方政府權力運作關係 (Börzel, 2001)；歐盟之「跨大西洋商業對話」(Transatlantic Business Dialogue) 如何影響英、法和德國之政商關係 (Cowles, 2001)；歐盟會員資格及權力義務如何影響德國公民權的內涵 (Checkel, 2001)；歐洲統合如何轉變英、法和德國的國族認同 (Risse, 2001)。最後，再由主編群比較專書章節的經驗案例是否與其分析架構所預測的歐洲化現象相符 (Cowles & Risse, 2001)。他們總結地發現各國各政策領域回應歐洲化的調適壓力有相當大的歧異，其中主要原因是各國國內既有體制、行動者之偏好和動員能力會影響國內政策最終是否改變。

類似 Cowles, Caporaso 和 Risse 所提的「歐洲化」分析架構亦出現在 Knill (2001) 和 Börzel (2002) 的專書中。雖然兩位作者的比較案例限於英國與德國，以及德國與西班牙，但 Börzel 宣稱其分析架構可應用到其他經驗案例 (Börzel, 2002: 12)。較鬆散的比較分析架構則未建立「歐洲化」的因果關係假設，僅提出相關的比較面向

供章節撰寫人參照應用。例如 Wessels, Maurer 和 Mittag (2003) 所主編的專書 *Fifteen into One?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Member States* 便採用鬆散的比較面向來探討歐盟及會員國自馬斯垂克條約以後，其政體和政策如何「共同演化」(co-evolution)。三位主編要求章節作者探討各會員國的政治體系(如政府、政體、政黨、政策、利益團體、民意基礎、府會關係、府際關係、中央與地方關係等)如何因歐盟的平行演化而有所調適和轉化。像如何調整組織結構和資源來參與歐盟層次的政策制定。該書的比較案例為當時全部歐盟會員國(15國)，而個案中所討論的面向大致與編者期許相符，最後編者再統整章節個案的發現，指出各國體制和政策的調適其實是介於程序調適和結構革命之間(Mittag & Wessels, 2003: 413-454)。

Wessels 等人的研究將當時歐盟所有會員國列入比較對象。這種研究設計的優點是書中歸納所得是來自研究母體(非樣本)，因此其共同發現可代表歐盟所有會員國皆存在或排斥的調適方式。但這設計的缺點是各國調適方式的變異程度太大和特異點太多，相關因素未受到控制，於是歐洲化或歐盟是否及如何衝擊各國國內體制和政策之因果關聯並未釐清。這種列舉比較面向但未探討因果關聯的分析架構所呈現的結果，頂多只是增加未來研究變數的數目，並無法證明什麼。

然而，就一新發展的研究課題，如「歐洲化」而言，類似 Wessels 等人的大量案例比較研究是有其必要的。因為這種鬆散的分析架構使得研究者有較大彈性去開拓未知的相關變數，也可以開拓新的研究子題(如納入新的國家或新的議題)，並重複檢視既有歐洲化的相關假設。這對知識延展性有一定的幫助。因此，筆者發現坊間多數編輯的專書皆採鬆散比較模式。例如，Zeff 和 Pirro (2001) 的專書探討歐盟十五個會員國如何執行歐盟政策；歐盟政策則以三支柱架

構區分，章節作者則被要求探討各國國內不同的執行機制及成果，所遇困難為何等問題。Kohler-koch 和 Eising (1999) 所編的專書則探討會員國國內不同政策層面的決策和執行如何受到歐盟網絡治理體系所影響；該書不但包括環境政策、基因改造政策、社會政策、EMU 政策、交通政策、專業服務產業、電力能源產業等政策變動，亦說明各國既有治理體系如何調適。Goetz 和 Hix (2001) 編輯的專書則僅於緒論介紹「歐洲化」研究的概念發展和理論假設，並未要求章節作者採取同一分析架構去處理特定主題之歐洲化現象。例如，該書章節探討歐洲統合對各國政黨體系、選民抉擇、社會運動、政策社群、泛歐傳媒、政治溝通、資淺國會議員、司法行政和中央行政單位之衝擊。雖未有一總結來比較各章發現，但該書拓展「歐洲化」研究議題之意圖非常明顯。

晚近，Schimmelfennig 和 Sedelmeier (2005) 編輯的專書則拓展研究主題至探索加入歐盟前，中、東歐候選國（以捷克、匈牙利和波蘭為主）之歐洲化現象（以採行歐盟法規為依變項）。編者於緒論提出「歐洲化」的三種模型做為相對解釋，即外在誘因模型（external incentive model）、社會學習模型（social learning model）和汲取教訓模型（lesson drawing model）。章節作者則被要求檢證外在誘因模型的解釋效力。該書比較歐盟中的中、東歐候選國在自由民主體制、少數民族人權、行政改革、區域政策、衛生政策、社會政策、環境政策、農業政策、人員流通及中央銀行等政策的變動。他們發現歐盟所要求的入盟條件，即民主條件（democratic conditionality）和歐盟法的條件（acquis conditionality），隨著歐盟的入盟承諾變得可信而成為有效的外在誘因，促使所有中、東歐候選國即時或提前採行歐盟法規。不過在民主條件的履行上，歐盟會籍的外在誘因有時並不足以促使拉脫維亞及立陶宛採行歐盟規定去保障少數俄羅斯族

裔之人權 (或投票權)，因為當局害怕選民結構會因此而改變。即使調適成本不變，中、東歐國家推行民主化可能不是來自歐盟民主條件的要求，而是內部民主力量的茁壯。至於有關歐盟法的採行，歐盟法規的正當性 (legitimacy) 並非中、東歐國家所考慮的因素。反倒是歐盟會籍的誘因才是其採行歐盟法之主因 (Schimmelfennig & Sedelmeier, 2005: 210-228)。

四、以「階段比較法」釐清「歐洲化」之淨效果

的確，隨著「歐洲化」研究議題不斷延伸，我們發現就連傳統國家主權象徵極強的外交暨安全政策亦被納入「歐洲化」的研究範疇 (Dover, 2007; Major, 2005; Wong, 2006)。然而，研究議題及案例的擴充並不表示「歐洲化」的因果關係已獲釐清，或其相關假設已被證實。反而因為比較研究所歸納出的解釋變數增多，使得我們必須使用更嚴謹的研究設計來分析更多案例以確保歐洲化之衝擊的確存在。為釐清「歐洲化」的淨效果，Levi-Faur (2004) 採用「階段比較法」(stepwise comparison) 之研究設計。以電力和電信產業為分析對象，試圖釐清「歐洲化」與全球自由化趨勢對於歐盟十四國國內產業自由化之影響。首先，Levi-Faur 比較除歐盟會員國外的所有國家之電信和電力產業之國家管制權威向下 (downward) 轉移趨勢。所謂「向下」轉移是指管制權威從中央決策者轉至各產業別之規範單位。例如，於個別產業建立獨立自主的規範機構去管理該產業；不但不受政治力干預，而且尋求財政和法制上獨立自主。他發現歐盟會員國除外之其他所有國家中，有 68% 國家在電信產業設有獨立規範單位，其中又有 74% 讓這些產業別的規範單位具法制獨立性。在電力產業只有 38% 國家設有獨立規範單位，其中有 55% 國家允許該規範單位具法制獨立性 (Levi-Faur, 2004: 14-15)。這個

趨勢其實與歐盟會員國之電信和電力產業的管制權威移轉趨勢相符。這意謂著歐盟會員國在電信和電力產業移轉管制權威的原因可能不僅是歐盟政策壓力，也可能反應全球產業政策制定者對移轉管制權威的成本效益評估相同。

為檢證會員國轉移中央管制權威至各產業規範單位真的是來自歐盟政策之壓力，Levi-Faur 在第二階段採「最大差異系統」，比較歐盟十四國 (EU14) 和拉丁美洲十六國 (LA16)。因為 LA16 之國家傳統、經濟發展程度、民主政體穩定度及官僚效率皆與 EU14 大相逕庭。如果歐盟會員國身分真的影響 EU14 的電信和電力產業自由化，則我們應非常容易發現 EU14 和 LA16 呈現不同自由化樣態。但他卻發現不論從產業私有化，或建立產業規範單位來看，LA16 和 EU14 皆呈現相同趨勢。例如，86% 的 EU14 和 81% 的 LA16 國家設立產業別的獨立規範單位，彼此差距不大。又在電信產業私有化上，EU14 其實落後 LA16 國家兩年。而且就所有權結構 (ownership structure) 而言，LA16 和 EU14 亦無太大差別，甚至到了 2000 年兩者之所有權結構更加相似 (Levi-Faur, 2004: 16-19)。這意謂著 LA16 國家在沒有任何歐盟政策影響下仍然從事與 EU14 相似的產業自由化。可見得歐盟政策對 EU14 國家之電信及電力產業自由化的衝擊是被高估了。

Levi-Faur 在第三階段採「最大相似系統」去比較 EU14 和 8 個既民主又有錢的國家 (即澳洲、加拿大、美國、日本、挪威、紐西蘭、以色列和瑞士，簡寫為 D&R8)。如果「歐洲化」真有影響力，我們預期 EU14 和 D&R8 國家會呈現不同的自由化趨勢，但其差異較難被察覺。這是對「歐洲化」效果之最不友善的情境 (most unfavorable case)。如果 EU14 和 D&R8 呈現不同樣態，則我們預期在其他友善的比較案例 (如 LA16) 上歐洲化效果仍會顯現。可惜的是

Levi-Faur 發現 EU14 與 D&R8 的電信和電力產業自由化趨勢幾乎完全相同。特別是在歐盟具強制力的競爭政策上，EU14 在競爭政策指標的表現理應與 D&R8 不同，但 Levi-Faur 卻仍無法發現任何歧異。因此，Levi-Faur 不得不質疑「歐洲化」的衝擊是否存在。

最後，如果歐盟競爭政策真的促使會員國朝向其所設定的產業自由化建制趨合，則現在這種趨合力量應比過去沒有歐盟的時候更加強大。爲了檢證此假設，Levi-Faur 比較現在歐洲自由化的擴散速度與十九世紀歐洲國有化的擴散速度。尤其在電信和電力產業上，二十世紀的主流思潮認爲國有和國營才是最佳措施。因此，在無類似歐盟般的國際建制情況下，十九世紀國有化擴散速度應不及歐盟存在時期產業自由化的擴散速度。的確，在電信產業國有化上，EU14 花了將近一百年時間才達成，但在其私有化上，卻僅花了二十年時間即達成；同樣的在電力產業國有化上，歐盟十國花了六十年時間才達成，但歐盟八國僅花了十五年時間便達成私有化 (Levi-Faur, 2004: 22)。這似乎意謂著歐盟加速其會員間互賴，或歐盟競爭政策起了作用。但更仔細地橫斷區域來比較 EU14 和 LA16，Levi-Faur 發現兩者產業自由化擴散的速度幾乎完全相同。因此，我們無法證實「歐洲化」或歐盟政策是 EU14 採取產業自由化的主因。

Levi-Faur 使用的階段比較法是透過比較「外部樣本」(outside sample) 方式來釐清「歐洲化」或歐盟政策對其所有會員國之淨衝擊。雖然採用性質分析，但是透過嚴謹的比較方法設計，他的研究成果不但有助於釐清「歐洲化」與其他干擾因素的相對影響力，且因其探究案例幾乎涵蓋所有歐盟會員國，故研究成果能被通則化。不過 Levi-Faur 的研究設計仍無法同時控制多項外在或內生的相關因素，並檢證依變項 (即電信及電力產業自由化) 和自變項 (即歐盟政策) 之因果關聯。Levi-Faur 的研究告訴我們「歐洲化」之淨效

果不大，但卻未說明哪些因素（包括「歐洲化」）導致會員國的產業自由化。欲回答這類問題，我們只能仰賴眾多案例的量化研究了。

可惜的是，在「歐洲化」研究的領域裡，使用大量案例的量化研究屈指可數。原因是早期歐洲化的研究單位大多是總體層次 (macro-level) 變數，如國家行政體制，或政策產業類別，故邏輯上已限制了可觀察案例的數目。另外，過去亦缺乏研究團隊去有系統地搜集大量個體資料。然而晚近因「歐洲化」研究議題擴充至政治體系的組成要素，如政黨、媒體、利益團體、選民抉擇、政治精英、社會運動等，於是分析單位也逐步降低至個體層次 (micro-level) (Haverland, 2007)。運用既有的個體資料，或利用內容分析法將質化轉成量化資料乃當前「歐洲化」研究的趨勢之一。舉例來說，以會員國轉化歐盟法規的記錄 (transposition records) 和違法舉發之記錄 (infringement procedures) 為基礎，Sverdrup (2004) 以敘述統計呈現歐盟及「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 EFTA) 會員國履行歐盟和「歐洲經濟區域」(European Economic Area; EEA) 相關法令的情況。他發現歐盟會員國自一九九七年五月到二〇〇二年十一月間平均未履行 / 不轉化歐盟法規的比例從 7.5% 降至 2.1%，EFTA 國家 (指冰島、挪威和列支敦士登參與 EEA 者) 則從 7.8% 降至 2.9%。因此整體來看，EU 和 EFTA 國家的「執行赤字」(implementation deficit) 是在縮減中。但是未履行 / 不轉化歐盟法規平均比例以大國表現較差，例如在二〇〇二年十一月法國仍有 3.8% 未履行 / 不轉化的歐盟法規，但瑞典、丹麥和芬蘭卻只有 0.5%。就政策別來看，歐盟的交通政策指令被執行的狀況最差，社會、通信和消費者政策指令則有較佳的執行狀況。

最後，Sverdrup 發現北歐國家的執行狀況一般優於非北歐國家 (Sverdrup, 2004: 31-33)。類似的樣態發生在歐盟執委會及 EFTA 監

控總署 (EFTA Surveillance Authority; ESA) 向會員國所發出的「正式警告函」(Letter of formal notice; LFN)、「見解意見書」(Reasoned Opinions; ROP) 及移送至歐洲法院案例 (Referral to Court; RTC) 的數量上。大國和非北歐國家所收到 LFN、ROP、RTC 的數量遠超過小國和北歐國家。整體來看，自一九九五年到二〇〇一年 LFNs 的數量從 1,106 件增加至 1,412 件。在一九九五年每一歐盟會員國平均收到 68 件 LFNs，但到二〇〇〇年已增至 88 件。同期每一歐盟會員國每年平均收到 ROPs 的件數，也從 13 件增至 37 件。就被移送法院案件數目而言，其總數則從一九九五年的 72 件增至二〇〇一年的 155 件。其中大國 (特別是法國、義大利和德國) 被移送法院之案例較小國多。北歐國家 (瑞典、丹麥、挪威) 被移送法院的案件很少，一九九五年至二〇〇一年總共只有 19 件，比義大利單一年份被移送的案件都少 (Sverdrup, 2004: 35-38)。他們認為北歐國家尋求共識的傳統使其爭端皆在庭外和解 (即早在 ROP 階段便解決)，所以被移送法院案例非常少。Sverdrup 依上述敘述統計資料，初步檢證三種「執行模型」(implementation models)。其中他的趨勢資料 (trend data) 證實 EU/EFTA 強化監控及移送能力與其會員國未履行 / 不轉化法規比例的降低有統計相關性 (Sverdrup, 2004: 38-40)。因而似乎證實會員國在執行歐盟法規層面上的確有「歐洲化」的現象。

五、以統計模型檢證「歐洲化」之相關假設

比較敘述統計資料是建立依變項與自變項相關性的第一步。欲控制其他干擾因素，如北歐的爭端解決傳統，則研究者仍須建構較精緻的統計模型。Schneider 和 Häge (2008) 探討「國際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 Develop-

ment; OECD) 20 個會員提供公共基礎建設的狀況。他們發現自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以後，OECD 國家提供「公共基礎建設比例」(public infrastructure ratio; PIR) 快速降低。在一九八三年時 20 個 OECD 國家平均 PIR 還有 87%，到了二〇〇〇年平均 PIR 降至 41%。但同期 PIR 之標準差卻逐漸擴大。顯示各國對公共基礎建設「私有化」的方式及步驟仍有不同做法 (Schneider & Häge, 2008: 2-4)。接著兩位作者建構回歸模型，試圖探討到底歐盟會籍是否會影響 20 個 OECD 國家公共基礎建設比例的變動幅度，並控制其他干擾變數，如政府意識形態、組合主義治理模式、制度限制、政府債務、金融市場法規鬆綁及貿易依存度等變項。他發現右派 (新右派) 政府意識形態和是否是歐盟會員國對於 PIR 變動幅度皆具統計的顯著影響力。換言之，Schneider 和 Häge 控制相關變數後，仍發現「歐洲化」對於 20 個 OECD 會員國之公共基礎建設的自由化造成衝擊。雖然筆者對於這篇論文的結論存疑 (因為其分析樣本數太少，即 $N=20$ ；同時又納入七個自變數造成，故分析自由度不足)，但是兩位作者透過簡單的回歸模型來控制其他干擾因素，並釐清依變項與自變項關係的努力，是值得後學者仿效的。

其實任何量化統計方法皆受限於分析樣本數目。欲增加分析樣本數目，研究者可以考慮降低觀察層級。例如，欲研究「歐洲化」對地方治理的衝擊者，可以考慮將分析單位從區域、省降至郡、縣，甚至鄉、鎮、市層級以增加樣本的數目。的確，De Rooij (2002) 以荷蘭人口五千以上的市鎮 (municipalities) 做為分析單位，發現歐盟對其影響力甚微。Fleurke 和 Willemse (2007) 則研究荷蘭 Almere 市和 Lelystad 市的市府「決策檔案」(decision files)，以及兩市所處的 Flevoland 省之決策檔案。他們一共取得 198 個檔案，並分析這些決策檔案的政策形態及歐盟影響力。他們在 Lelystad 市及 Almere

市決策檔案中，發現各有 48.5% 和 35.8% 檔案具有歐盟影響力的影子，其中歐盟具直接影響力者各佔 12.5% 和 16.7%，至於在 Flevoland 省決策檔案中，歐盟具影響力者佔 45.9%，其中 61.5% 是歐盟直接影響力 (Fleurk & Willemse, 2007: 81)。換言之，運用敘述統計，Fleurke 和 Willemse 已察覺歐盟對地方政府的影響主要是針對省級政府而且是直接的。歐盟對省轄屬的市政府影響力主要是間接的，且影響力較小。兩位作者雖未採用統計模型，但因其樣本數夠多，故未來統計分析的自由度較大。

除了降低觀察層級外，研究者也可使用訪問調查法和內容分析法去取得大量樣本和資料。Beyers 和 Kerremans (2007) 探討德、法、荷蘭和比利時的利益團體如何調整其行動策略來因應歐盟所創造的政治機會和影響力管道。從二〇〇三至二〇〇六年，他們針對四國官員和利益團體幹部進行問卷調查，共取得 475 份有效樣本。他們所設計的問卷不但力求具有跨國比較之效度，而且其所訪談的利益團體也力求各國樣本結構平衡，即納入不同 NGOs (N=140)、商業團體 (N=251)、公會 (N=82) 等。他們的封閉性問卷則包括政治體系特徵；受訪者針對 20 項政策之立場和遊說策略；受訪者所掌握的資源和所投資的政治活動；利益團體奠基於國內或歐盟政策網絡等問題。接著根據作者的「歐洲化」操作定義 (即利益團體認知到歐洲的衝擊，並將歐洲因素列入決策考量) 報告其敘述統計資料。發現大約有 61% 到 88% 的受訪者認為歐盟政策對其利益團體有重大影響力。其中又以德、法利益團體幹部對歐盟政策影響的感受最深。從問卷結果，他們也發現德、法利益團體花在歐盟政策的時間和精力遠超過荷蘭和比利時的利益團體。其中商業利益團體投注在歐盟的時間和精力又超過工會和 NGOs (Beyers & Kerremans, 2007: 467-468)。其次作者說明各國利益團體的關鍵資源依

賴度和預算競爭的主觀感受。例如，在工會有 90% 財源來自政府補助，商業利益團體之財源則較多樣化。主觀上也以財源多樣化的商業團體較不會感受到預算競爭壓力。最後作者用相關分析來說明關鍵資源依賴度與利益團體被歐洲化的相關性。他們發現若利益團體的關鍵財源來自政府補助愈多，則該團體被「歐洲化」的程度愈小 (Beyers & Kerremans, 2007: 473-474)。可惜的是兩位作者並未詳加運用這份大樣本的訪調資料去控制歐洲化的干擾因素。僅以相關分析來推論因果關聯，似乎稍嫌薄弱。

最後 Pennings (2006) 採用政黨政綱 (party manifesto) 的內容分析結果來探討各國政黨的「歐洲化」過程。Pennings 的「歐洲化」操作化定義是每一選舉年每一政黨政綱在二十項政策領域「共同提及」(co-mention) 該政策以及歐洲或歐盟的次數頻率。例如，若農業相對於歐盟或歐洲被提起十次，而相對於其他議題領域被提及一百次，則歐盟或歐洲與農業的連結度 (linkage) 是 10%。概念上，Pennings 稱政黨政綱在農業問題的「歐洲化」程度是 10%。依此歸類原則計算，Pennings 針對一九六三至二〇〇三年十五個歐洲國家八十八個政黨進行政綱的內容分析，並將其列入資料矩陣，共取得一萬五千筆資料。在所有政策領域，他發現「共同提及」歐洲或歐盟的頻率比例以歐盟會員國較高，而且愈早加入的會員「共同提及」歐洲或歐盟的頻率比例愈高。不過歐體 / 歐盟創始會員國「共同提及」歐洲或歐盟的頻率比例並未逐年顯著增加。這意謂著這些會員國的政黨並未以歐洲議題定位自我和區隔對手。儘管歐盟會員國政黨較非會員國政黨黨綱「共同提及」歐洲或歐盟的頻率比例為高，但是兩者差距不大，顯示政黨政綱「歐洲化」的現象不僅限於歐盟會員國。歐盟或歐洲統合之影響力可以是間接地外溢擴散 (Pennings, 2006: 259-263)。

此外，從個別政策領域來分析，Pennings 發現所有政黨政綱「共同提及」歐洲或歐盟的頻率比例在經濟金融領域最高，其次才是攸關福利國家的分配性政策領域。至於仍屬會員國權責的社會政策領域，各國政黨政綱「共同提及」歐洲或歐盟的頻率比例最小。這項發現大致與歐洲統合歷史相符。所以，從歐洲政黨角度來看，歐洲統合的主要目的是創造經濟利益，而非干預內部資源重分配。至少政黨希望呈現給選民的政黨立場便是如此。同時 Pennings 也發現態度支持歐洲或內部態度一致的政黨也較反對者或分裂者更會「共同提及」歐洲或歐盟 (Pennings, 2006: 264-267)。不過，筆者重新檢視 Pennings 文中的表 4 和表 5 後，發現上述其所宣稱之結果並非正確。例如，表 4 呈現在對外關係、人道援助和安全政策領域上，所有政黨政綱「共同提及」歐洲或歐盟的頻率比例遠高於對外貿易或經濟政策領域。Pennings 並未報告這項結果，但其表 4 所呈現似乎與歐洲統合歷史，特別是功能整合歷史不符。為什麼歐洲政黨政綱要在這些主權象徵頗高的議題提及歐盟呢？是否在此提及歐盟正可區隔其與對手之政策立場呢？又如其表 5，筆者發現不論政黨態度是疑歐或擁歐，內部態度是一致或分裂，早期 (1980-1989)「共同提及」歐洲或歐盟的頻率比例明顯低於近期 (1990-1999)，但 Pennings 並未報告這項趨勢。如果這項趨勢確實，則我們是否可以推論歐洲統合或歐盟深化使得歐洲政黨政綱提及歐盟或歐洲的頻率比例增加呢？是否可以算是政黨政綱「歐洲化」的證據呢？最後在 Pennings 的表 5 中，態度疑歐或分裂的政黨「共同提及」歐洲的頻率比例並非較小，有許多例外 (例如人道救援、公共衛生、安全環境、司法政策等) 仍待解釋。筆者在此列舉 Pennings 文中的推論缺失或證據不足的目的，主要是要彰顯量化資料的重複檢證特性。由於大規模量化資料是經由科學分類及系統編碼取得，於是其他研

究者可以同樣資料基礎去重複檢證 (repetition) 前人的發現是否屬實。這項重複檢證的優點也許在質性研究中較難取得。例如，每次田野調查所得之人、事、時、地、物資料可能截然不同，於是縝密敘述所得結果並無法讓後學者重新檢證其正確性。

肆、「歐洲化」的理論建構與因果推演

任何理論建構皆從研究主題的定義和概念出發，「歐洲化」研究亦不例外。雖然本文第二、三節所討論的「歐洲化」定義和概念仍有諸多爭議。但隨著研究範疇的擴大，我們似乎可以辨識一個廣被接受的「歐洲化」定義，即歐洲統合（或歐盟治理體系）對國家體制和政策的衝擊或調適過程。這個定義隱含著由歐洲化到國家層次的衝擊或調適壓力，因此預設了「由上而下」的理論建構。但「歐洲化」亦可指涉歐洲國家刻意將其體制或政策偏好移植至歐洲層次，以預先紓解調適壓力。依此定義，則「歐洲化」的理論建構應採「由下而上」(bottom-upper) 方式。然而，概念上幾乎所有學者皆可接受「歐洲化」是指歐洲與國家層次的體制和政策的雙向互動過程。只不過為操作之便，研究者通常僅分析某單向因果關係，而且建構特殊的分析架構做為經驗觀察之用。

首先，筆者以 Cowles, Caporaso 和 Risse 的歐洲化「三步驟」分析架構為例（見圖 3），說明「由上而下」及「由下而上」的理論建構。所謂「歐洲化過程」是指在歐洲層次所出現或存在的正式和非正式規範 (norms)、規則 (rules)、法規 (regulations)、程序 (procedures) 和措施 (practices)。端視研究主題，上述「歐洲化過程」可以指涉歐盟的政策指令、歐洲法院的判例、對歐盟規範的非正式解讀、或對歐洲文化的共同理解等。這些歐洲層次結構規範措施若與國內層次的結構、規範、措施有所歧異或不甚「契合」，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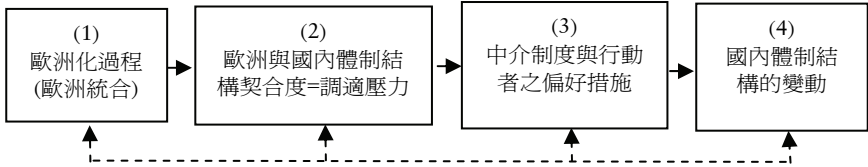


圖 3 歐洲化「三步驟」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引自 Risse, Cowles, & Caporaso (2001: 6)。

會對國家產生調適壓力。原則上，調適壓力大小決定該國國內體制和政策變動幅度。換言之，客觀結構的「契合度」(goodness of fit) 決定調適壓力大小，而調適壓力大小則會影響國內體制和政策是否和如何變動。至於國內體制和政策是否真的變動或調適，則需看中介制度和行動者如何回應調適壓力。Risse 等人辨識幾項中介變數，即多重否決點的存在與否，正式制度是否促進改革，政治組織文化所能容忍的改革空間，行動者所被授予的能力差別及社會學習等 (Risse, Cowles, & Caporaso, 2001: 6-12)。如果上述中介變數不利於國內體制和政策改變，儘管調適壓力存在，則國內體制和政策之變動則不如理論預期，往往產生分歧的調適現象。這也是為何經驗證據往往不支持一致趨合的調適現象。儘管調適壓力相同，但各國調適方式卻不同。

以上呈現「由上而下」的歐洲化理論建構，其因果關係毫無疑問地是單向地由歐洲到國家層次。問題是即使我們觀察到國內體制和政策的變動 (或不變動)，則是否我們可據此推論「歐洲化」現象的確存在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仍有許多內生和外在因素會影響國內體制和政策的變動。因此採取「由上而下」的理論建構觀者通常明白表示「歐洲化過程」，或歐洲與國家層次的結構「契合度」，或調適壓力大小只是國內體制和政策變動的必要但非充分條件

(Börzel & Risse, 2003: 60-62)。

正因為此，爲了探究「歐洲化」的真正影響力，有些學者建議應採用「由下而上」的理論建構 (Radaelli & Pasquier, 2007: 41)。這種理論建構從國內層次出發，即先觀察國內體制和政策之現狀；陳述現狀下國內行動者所處決策環境、遭遇的困難、可用的資源、內部論述，以及歐洲 / 歐盟除外的國際因素，並小心翼翼地描述體制和政策變動的歷史過程，最後再評估歐洲 / 歐盟因素介入的時點和壓力，以確認「歐洲化」的真正影響力。如圖 3 所示，「由下而上」的理論建構是從 (4) 步驟回溯到 (1) 步驟。因爲研究者特別注重國內體制和政策變動的時間順列和內外干擾因素，故可以同時檢驗「歐洲化」與其他相對解釋模型 (如全球化或自由化等) 之影響力。

一、從「由下而上」到「雙向互動」的「歐洲化」理論

須注意的是，「由下而上」的理論建構並不一定預設逆向因果關係，即從國內體制和政策變動來影響歐洲化過程。儘管歐洲化的逆向因果關係是完全合理的假設，但如前所述，此乃傳統歐洲統合理論所欲探討的主題。如果會員國刻意「上傳」或「移植」其體制或政策偏好及措施至歐盟，做爲緩解調適壓力之策略，則此應爲「歐洲化」之研究範疇。但在理論建構上，這應屬於雙向互動模型所欲解釋的對象。其實，研究「歐洲化」的學者早已注意到這種歐洲與國家層次的雙向互動過程 (Bulmer & Burch, 2001; Héritier, 1995)，但嘗試將其概念化或理論化則是近幾年的努力。例如 McGowan (2005) 在評估歐盟的 (反) 價格壟斷政策 (cartel policy) 的現代化時，便使用「歐洲化」的釋出 (unleashed) 及反彈 (re-

bounding) 的概念。他認為歐盟 (反) 價格壟斷政策的演化是歐盟與會員國的雙向互動過程。如圖 4 所示，會員國經協商分攤主權至歐盟而建立 (construction) 競爭政策建制 (1)。然後，歐盟建制的要素逐漸被會員國下載吸收 (downloading assimilation)。會員國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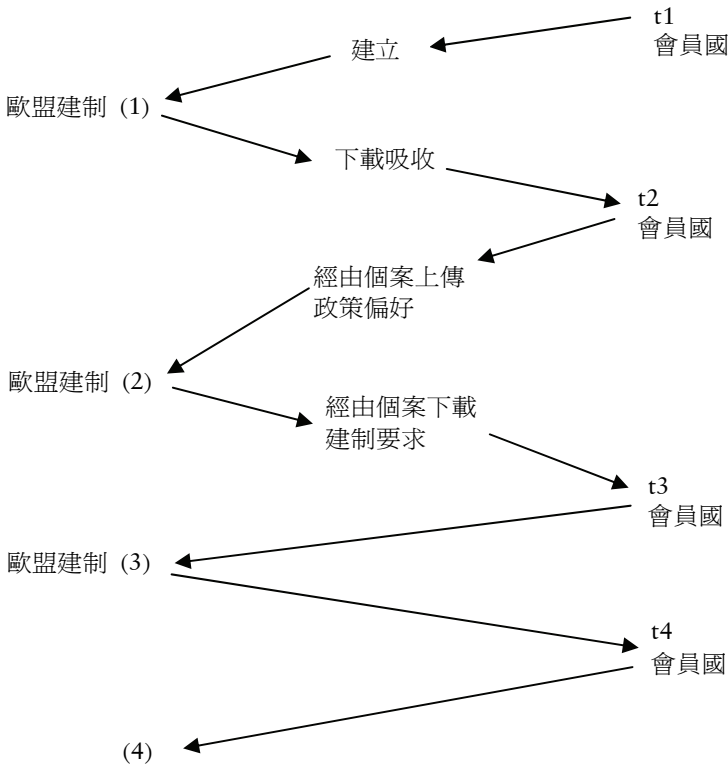


圖 4 歐盟反價格壟斷建制之「歐洲化」

資料來源：McGowan (2005: 999)。

說明：「經由個案上傳政策偏好」和「經由個案下載建制要求」較為貼切，因為原文使用「個案法」(case law) 稍顯狹窄。

本身偏好及條件一方面執行歐盟法規，另一方面則試圖將其政策偏好以個案訴訟方式上傳 (uploading) 至歐盟。歐盟競爭政策建制 (1) 與會員國政策偏好可能有所衝撞 (collision)。但不論歐盟建制 (2) 是否因個案衝撞而改變，它都會再下載至會員國而要求其履行。於是會員國須設法吸收並再以個案訴訟方式上傳其政策偏好至歐盟。這個互動過程便被稱做歐盟的 (反) 價格壟斷建制之「歐洲化」。

在經驗檢證上，McGowan 透過縝密敘述及過程追蹤去描述歐盟競爭政策的演化，並同時評估「現代化」與「歐洲化」的解釋效力。他指出歐盟競爭政策建制自從一九六〇年代早期創立以來，經由判例法的累積、一九八〇年代新自由主義思潮洗禮、單一市場的建立，以及一連串地任命高知名度、具實權能力的競爭執委，和一九九〇年代競爭總署取得企業併購監控權後，已高度滲透至會員國的競爭建制。但從時序來看，早期會員國多出於自願而採行歐盟的競爭政策規定，例如：義大利和荷蘭先後於一九八〇至九〇年代間採行歐盟的競爭規則，到了一九九八年，有半數 (八個) 以上的歐盟會員國的競爭建制有能力執行羅馬條約第 81 條 (即禁止價格壟斷阻礙貿易等規定)，就連歷史悠久的英國 (1948) 與德國 (1957) 的競爭建制改革也吸納歐盟的規則。

不過，在所有國內競爭政策改革的案例中，改革壓力並非單向地來自歐盟，而是透過會員國與歐盟競爭總署協商，以及廣泛諮詢相關利益團體後，而產生的改革共識。尤有甚者，在權力下放的歐盟競爭建制下，會員國競爭政策的管制單位和法院得以引用歐盟競爭法規來裁決個案。於是經由個案裁決程序，會員國競爭建制得以參與和塑造歐盟的競爭法規。例如：歐體競爭法規 Regulation 1/2003 實際上法制化歐盟與會員國競爭建制行之已久的合作互動關係 (如交換訊息及合作網絡)。雖然執委會仍有最終裁決權，但一

般預期執委會競爭總署對會員國的干預是例外狀況。又雖然會員國採行歐盟競爭政策，但並不表示會員國不受外來影響。例如英國的二〇〇三年企業法 (Enterprise Act) 便比歐盟法規更進一步地將壟斷事業執事者課以刑事責任，這個規定顯然是美國競爭建制的現行措施。下一步，英國可能同意與第三國簽訂引渡協定，將壟斷事業罪行犯引渡至他國。英國的片面行動自然衝撞到歐盟現行競爭政策。但如果「歐洲化」是雙向互動過程，則 McGowan 預料歐盟競爭建制勢必有所調適 (McGowan, 2005: 998-1000)。

另一例子是 Bugdahn (2005) 建構雙向互動模型探討歐盟「環境資訊指令」(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rective, AIE) 在會員國的執行狀況。Bugdahn 認為，歐盟 AIE 在會員國的執行狀況不是單純的「歐洲化」現象，而是「歐洲化」與「內政化」(domestication) 的互動過程，所謂「內政化」是指政策選項並非來自外來建議或預先指定的。「內政化」的樣態則包括一切照舊運作；保守的詮釋法規變動，或使用既有的內部措施；內部監控；組織創新；積極詮釋法規或大幅改革。Bugdahn 接著以圖來說明四個回合的「歐洲化」過程。如圖 5 所示，第一回合歐洲化發生在歐盟層次，一旦歐盟採行政策 (有時甚至引用某些會員國的政策來形成歐盟政策)，則進入第二回合的「歐洲化」，即國內政策領域的調適和執行，此刻不同樣態的「內政化」皆可能成為國內調適的政策選項。一旦國內決策者採行某一樣態的「內政化」選項，則進入第三回合「歐洲化」，由歐盟啟動違規舉發程序，或鼓吹最佳措施以尋求會員國執行歐盟政策。最後，歐盟的壓力轉移至國內決策者，由其決定是否改變執行方式，或依某一內政化樣態去執行。此為「歐洲化」之第四回合。當然，這種雙向互動過程可以一直重複下去，反饋影響到歐盟原始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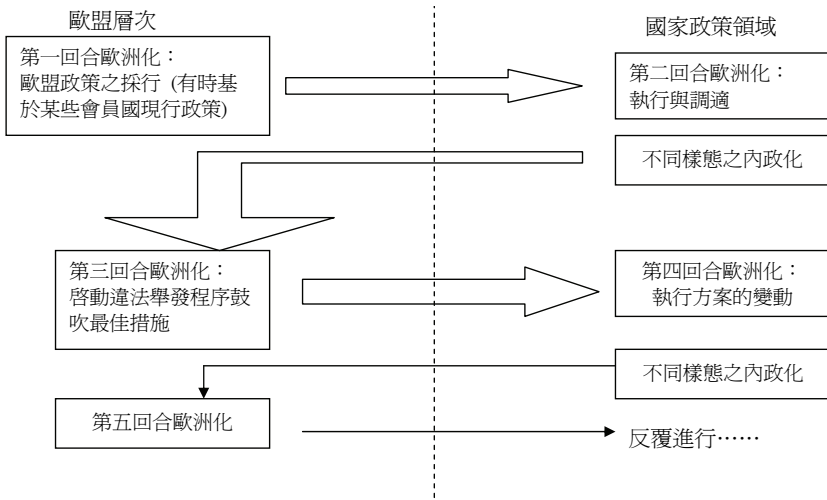


圖 5 「歐洲化」與「內政化」之雙向互動過程

資料來源：Bugdahn (2005: 181)。

接著 Bugdahn 提出「內政化」與「歐洲化」的操作化指標及假設。在經驗檢證上，Bugdahn 採用有限案例比較法，選擇英國、德國和愛爾蘭三例來說明其執行 AIE 時的「內政化」或「歐洲化」現象。其中德國因行政傳統與 AIE 相牴觸，故保守地轉化 AIE 規定，並緊縮地詮釋法規。愛爾蘭則因既有的國內建制已能履行 AIE，故一切照舊來因應 AIE。英國則介於德國和愛爾蘭，故發生「歐洲化」和「內政化」並存狀況。Bugdahn 採用質性敘述方式說明三個案例為何採行特定或混合形態的「內政化」和「歐洲化」，但對於兩者間的互動過程則僅點到為止。既未解釋兩者互動的機制為何，也未檢證兩者互動方向是否與其操作化假設相符。儘管如此，Bugdahn 在歐洲化的理論建構上仍有所貢獻。

將「歐洲化」視為雙向互動過程的理論建構雖在概念上並不困難，但在實證研究的操作化上通常只能仰賴個案分析或少數案例比

較方法，以便縝密敘述雙向互動的細節，並追蹤事件發生時序來釐清歐洲化的因果關係。這種研究設計雖可以呈現個案發展是否符合理論預期，但卻難以通則化。筆者認為早期 Deutsch (1957) 的「交流主義」(transactionism) 及晚近 Sandholtz 與 Stone Sweet 的動態功能整合模型皆具雙向互動理論的雛形 (Sandholtz & Stone Sweet, 1998; Stone Sweet & Brunell, 1998; Stone Sweet, Sandholtz, & Fligstein, 2001)。

在觀察指標層次上，Stone Sweet 等人蒐集 1958-1998 年各國法院依歐體條約第 177 條移送歐洲法院「先行裁決」的案例 (共 3,714 筆)，同期歐盟會員國彼此間貿易量，歐盟所採行的法規指令之數目，以及在布魯塞爾登記運作的歐洲利益團體數目。他們發現四項指標間存有互為因果關係，其互動過程即指向超國家治理。簡言之，Stone Sweet 等人發現隨著歐盟會員國彼此貿易量的增加，歐洲利益團體在歐盟遊說活動也增加，歐盟超國家組織也強化法規來排除貿易障礙；同時因為彼此貿易摩擦增加，各國法院受理貿易爭端案件也會增加，故移送到歐洲法院「先行裁決」的案件隨之大增。一旦歐洲法院做出先行裁決，法律疑義解除，則彼此貿易爭端隨之排除，交易成本也降低，於是促使會員國間之貿易量再增加。歐洲遊說團體則會進一步遊說歐盟訂定利己之規則，歐盟超國家組織則回應需求而訂定更明確規則來規範貿易。於是這個循環互動過程便描述了歐盟超國家治理動態。筆者延伸上述動態功能整合模型的研究成果，試圖建構一可供大量經驗資料檢證的「歐洲化」雙向互動模型。

筆者從操作化角度出發，將此模型區分為概念和指標兩層次。如圖 6 所示，概念層次的兩個主要變項是歐洲統合 / 歐盟治理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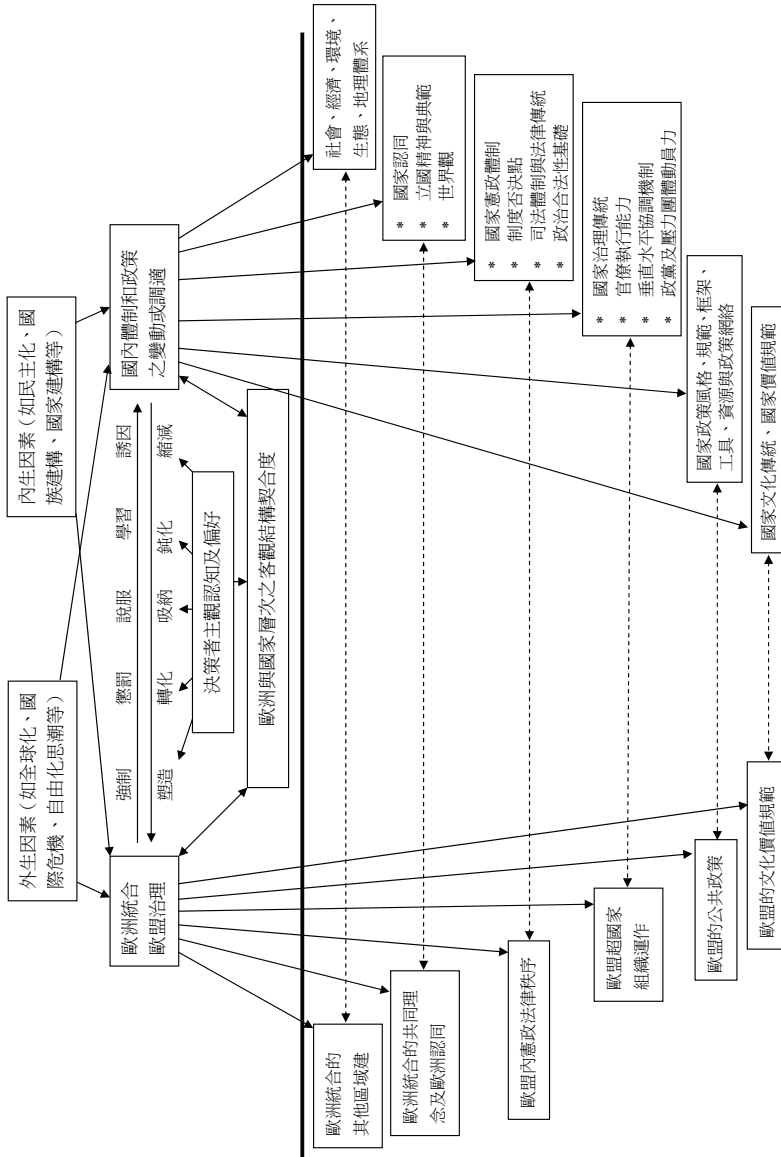


圖 6 「歐洲化」雙向互動模型之操作化

和國內體制及政策的變動或調適。⁴ 而且兩者之間存有互為因果的關係（雙向箭頭）。若暫不考慮其他中介因素，則我們可以針對兩主要變項設計有效測量的指標。這意味著，圖 6 各指標與兩主要變項概念間存有可被合理化的因果關係（以實線箭頭表示）。例如，研究者必須能夠合理化歐盟的憲政法律秩序，的確可以代表或測量歐洲統合或歐盟治理體系。我們可以說歐洲統合的產物之一即是歐盟憲政法律秩序。也可以說歐盟憲政法律秩序是歐盟治理體系的組成元素。上述兩種合理化說辭其實隱含不同因果假設。前種說法是指歐洲統合之結果，後種說法則指歐盟治理體系的次集合。假設我們可以接受上述合理化說辭，則我們仍必須進一步對歐盟憲政法律秩序設定可以觀察的指標，例如歐體法至上原則，直接適用原則，相互承認原則等被歐洲法院（ECJ）判例引用的次數，或各國法院移送 ECJ 先行裁決的判例數目，或執委會啟動違規舉發程序的次數等操作性指標。同樣地，這些操作性指標與歐盟憲政法律秩序這概念性指標仍須具有測量的效度與信度。即兩類指標間之因果指涉必須予

⁴ 圖 6 乃筆者結合表 1、圖 1 和圖 3 所提出之較複雜的雙向互動模型。圖 1 區分概念層次與操作層次。主要呈現國內體制和政策「變動」之概念化指標及操作化指標。「變動」可由減縮、鈍化、吸納和轉化等四概念化指標來表示。而各項概念化指標則進一步由（舉例的）操作化指標來測量。如同圖 1，圖 6 上部乃概念層次的自變項及依變項間之互動。概念上，圖 6 的「歐洲整合模式 / 歐盟治理體系」及「國內體制和政策變動或調適」是兩大變項。因兩者雙向互動，故有兩箭頭相互指向。圖 6 並不預設該雙向互動之次序，只列出互動過程中幾種可能的「變動」樣態（如縮減、鈍化、吸納……等），及相互影響中所可能使用的方法（如強制、懲罰、說服……等）。但圖 6 對「變動」態樣並未如圖 1 般進一步說明其操作化指標。原則上，圖 6 延伸圖 3 的基本模型而來。在概念層次，兩變數之互動是無法直接觀察的（基本方法論一向主張概念是無法直接測量的）。必須透過操作化指標的互動來呈現概念之互動。因此圖 6 粗實線（筆者修正處）以下列出許多操作性指標，並以雙向箭頭來標示其互動關係。因此，研究者對歐洲化的主要證據是來自指標層次的操作化指標的互動。而非直接觀察概念間的互動。

以合理化。

其次，如果在概念層次兩主變項間存有因果關係，則在兩變項之概念化指標及操作性指標間也應可觀察到相同的因果關係。因此，圖 6 虛線雙向箭頭指出兩變數概念化指標間存有因果關係。如果我們可以從變數操作的指標間證實彼此具有因果關聯，則我們便可以推論概念層次的變數間也具有某種因果關聯。須注意圖 6 之虛線箭頭似乎平行且一對一連結自變項和依變項的概念化指標。這並非作者原意，但是爲了避免圖 6 連線過度複雜，故省略其他可能的因果連線。讀者自然可以假設歐盟憲政法律秩序指標與國家政策典範指標也應具有因果關聯，因此兩指標間應有虛線連結。而歐盟憲政法律秩序與歐盟超國家組織運作也可能有因果關聯，因此，彼此間應有連線。依此類推，圖 6 的因果連線可以變得非常複雜難懂。面對龐雜因果系統研究，研究者通常先簡化地探索單一配對指標間的因果關係再慢慢連結到其他指標。以圖 6 爲例，我們可以先檢證歐盟憲政法律秩序與會員國訴訟文化的改變。在操作化指標上我們除了蒐集 ECJ「先行裁決」案例外，我們也同時蒐集會員國法院訴訟案例。如果「歐洲化」對會員國訴訟文化有衝擊，則我們應發現 ECJ「先行裁決」案例與純國內訴訟案例會有些差異，特別在訴訟當事人、議題、標的物、時間、花費、上訴頻率或法條援引等方面，「先行裁決」案例和純國內案例或許呈現不同趨勢。

一旦我們觀察到長期趨勢是具有歐體法救濟可能性的國內案例逐漸增加，但歐體法未能救濟的國內案例數目卻維持現狀，甚或減少，則我們初步假設 ECJ 的先行裁決機制會改變國內訴訟當事人訴訟習慣。換言之，訴訟當事人會優先選擇具歐體法救濟的案例提起訴訟，但對於純國內法定奪的案例則傾向庭外和解或尋求仲裁。果真如此，則我們得到的初步徵兆是會員國的訴訟文化被「歐洲化」

了。但是會員國法院受理純國內案件的數目不增反減，也可能受到其外在或內生因素所影響。例如，法官受理案件的能力是固定的，若部分法官必須投注精力審理與歐體法相關的案例，則其在固定時間所能簽結的案例便減少。如果我們蒐集的資料是簽結的案例，則觀察到的長期趨勢並不能說是訴訟文化的歐洲化現象，而是訴訟案件的分類使然。當然如果我們蒐集的是會員國法院受理的案例，則上述問題並不會發生。可是受理案件到簽結案件所需時間長短仍會影響當事人是否願意興訟。又國內訴訟的成本效益也是當事人考慮之一。這些外在和內生的中介變數應予以控制才能釐清依變項與自變項的因果關係。假定我們能蒐集大量的法院受理案件，不但包括所有會員國，也包括自一九五八年以後的所有國內法院案例，則這筆資料可以與 Stone Sweet 的 ECJ 先行裁決案例結合。然後再蒐集同時期其他相關變數，例如歐盟會員國間貿易量，及會員國內法人、商會、公會和利益團體數目、會員國內司法從業人員數目、會員國平均訴訟成本及時間長短等資料。則我們將可建構時間序列結構方程式 (time-serial structural equation) 來探討 ECJ 先行裁決案例和純國內案例的因果關聯，並控制其他中介變數的影響力。

二、「歐洲化」之內生及外在的中介變數

上述研究設計的靈感其實來自 Stone Sweet 等人的經驗研究。只不過筆者圖 6 的雙向互動模型更加複雜罷了。但是從概念操作化的角度來看，其實兩者如出一轍。儘管在上述例子我們用統計方法控制相關中介變數，但在概念上我們尚未討論因果推演中如何辨識和控制外在和內生的中介變數。圖 6 只是假設「歐洲化」現象具有外在和內生的中介變數，但是它們對於自變項和依變項如何影響，則有待釐清。首先，國內體制和政策的變動和調適不太可能僅由歐

盟或歐洲統合相關因素所引起的，會員國內部的改革力量及趨勢應被列入考量。例如圖 6 列舉民主化、國族建構、國家建構、全球化、國際危機和自由化思潮等內外因素。它們與兩主變項間的因果關係應先釐清。例如，全球化與歐洲化的概念到底是互補的還是互斥的？Wallace 認為「歐洲化」以特殊管理形態和制度資源回應了全球化的挑戰，而其回應的方式卻伴隨著「內政化」的現象 (Wallace, 2000: 369-370)。她的說法預設了「全球化」是因，而「歐洲化」是果，兩者在概念上是可以區分的。Verdier 和 Breen (2001) 則認為，在資本市場及勞力市場自由化上「歐洲化」是「全球化」的代理人 (agent)。他們的說法預設「歐洲化」乃「全球化」之建構組成分子 (component) 之一。姑且不論 Wallace 還是 Verdier 和 Breen 的說法是否正確，研究者所面臨的問題不僅是如何定義全球化，而且是如何將「全球化」概念予以操作化 (Giddens, 2003; Walters, 2001)。Weber 提出一個簡單操作化指標，即移動 (mobility)。不論是資本、勞力、貨品，和服務的跨國性、全球移動皆是全球化的指標 (Weber, 2001)。據此，我們可以蒐集長期的跨國界 (歐洲除外) 資本、勞力、貨品和服務的移動總量和速率，再比較歐洲區域的四大流通的總量和速率。兩者之間的相關性為何？是否歐盟境內之四大流通的總量和速率皆大於歐洲以外的全球四大流通呢？如果「全球化」會影響歐洲國家的國內體制和政策變動，則這個影響力是透過「歐洲化」而間接傳遞至國家呢？還是直接造成國內體制和政策變動呢？例如，Verdier 和 Breen 的研究便使用大量的時間序列，橫斷階層的 OECD 國家的市場自由化指標，來檢證市場全球化，市場歐洲化及自願歐洲化等假設，並控制其他干擾因素，以釐清全球化與歐洲化的關係 (Verdier & Breen, 2001)。從量化統計模型，只要樣本夠多，我們是可以控制全球化的影響力而找出「歐洲化」的

邊際影響力 (marginal effect)。但是在概念層次，研究者應思考在「全球化」和「歐洲化」之間，是否存有中介變數去影響兩者的相關性？如果存在，則圖 6 的因果連結會變得更複雜。我們不但要控制兩主要變項間的中介變數，即全球化，而且還得控制「全球化」與兩主變項間所存在的中介變數，以確保全球化真的與兩主變項具有因果關聯。

同樣的，國內體制和政策變動也可能受到民主化所影響。特別是中、東歐國家在冷戰後的民主轉型顯然會影響其國內體制和政策之變動 (Diamond, 1999; Huntington, 1993; Linz & Stephan, 1996)。民主化之所以影響國內體制和政策變動，可能來自其人權理念的散播、政治參與的擴大、民間社會力的釋放、社會資本財的普及以及制度運作的結果等。如果要將其操作化則可以分別蒐集國內社會團體和 NGOs 的成長，司法人權迫害的案例，選舉權的擴大等長期資料。另外我們也可以使用「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 所公佈的民主化指標來測量「民主化」的概念。如同「全球化」指標，我們應控制「民主化」與兩主變項間的中介因素，才能釐清「民主化」與兩主變項的因果關係。雖然從統計模型的操作化角度來看，控制中介變數看似相當直接而且輕而易舉。但在研究設計階段上，我們就應設法排除中介變數的影響力。本文前節所述的比較方法便從案例選擇中去控制中介變數的變異量。又個案分析中所採用「過程追蹤」方法也旨在控制時序間所產生的中介變數。另外，使用「外部樣本」也可以控制中介變數。

三、先以研究設計再用統計方法控制「歐洲化」的中介變數

社會科學研究為控制中介變數以便釐清因果關係，往往使用

「準實驗研究設計」(quasi-experimental designs) (Shadish, Cook, & Campbell, 2002)。然而，就筆者所知，眾多「歐洲化」研究卻鮮少採用準實驗研究設計。或許研究「歐洲化」的學者在建立其理論或分析架構時，便已將各變項的因果關係考慮進去。但在經驗檢證上卻鮮少學者使用準實驗研究設計去釐清因果關係。所謂「準實驗」是指缺乏隨機分配要素單位至各種情境的實驗，但它卻仍具有隨機分配實驗的擬似結構特徵。準實驗的因果推論條件與一般因果推論相同，即時序上「因」必須先於「果」，因與果必須有共變性(co-variance)，以及其他替代解釋皆不成立。此外，準實驗設計特別著重辨識可能危害主變項間因果關聯的「內部效度」(internal validity) 之因素。中介變數和外在或內生變數便是顯例。準實驗研究者認為應優先使用研究設計來控制中介變數，統計控制應留到最後來釐清中介變數的殘餘影響力。

最後，準實驗設計使用「一致性形態速配」(coherent pattern matching) 方法來降低其他替代解釋的可能性。具體做法則採用「非等同依變項」(nonequivalent dependent variables) 和「預測交互作用」(predicted interactions)，來展現主要變項間非常複雜的因果關聯仍具有邏輯一致性。而其他較簡單的替代假設卻無法解釋或預測相同複雜的因果關係形態，因而排除替代解釋的可能性。由於國際關係及比較政治領域鮮少具備控制組來進行實驗，故筆者建議「歐洲化」研究可運用無控制組的準實驗設計。例如，Shadish、Cook 和 Campbell 列舉七項無控制組的準實驗設計。第一項是「單一群後測設計」(one-group posttest-only design)。研究者只得到一個實驗後的觀察，但卻無法判斷變動是否發生，或是否因某刺激(stimulus) 而發生。例如，假設我們觀察到國內某體制發生變動，我們仍無法斷定變動是歐洲化(可被當成實驗裡的一種刺激) 引起

的。但如果該體制歷經幾百年各種外在刺激皆無所動，而最近卻發生變動，則我們可推論「歐洲化」或許有影響。

第二項準實驗設計「單一群多重後測設計」(one-group post-test only design with multiple substitutive posttests) 是指運用不同的測量指標做為後測觀察點。若這些不同測量指標皆呈現理論預期的方法和效果，則我們會較有信心去推論變項間的因果關係。但是這種設計的缺點誘導研究者犯下「類型一錯誤」(Type I Error)，即錯誤地證實「虛無假設」(null hypothesis)。因為即使會員國內行政組織、人員編制、政策走向等(多重指標)皆與歐盟政策預期相符，但我們仍無法據此推論「歐盟」便是其原因。在此設計中我們只觀察到形態一致的後果，但這一致的形態並非獨一無二的現象。除非歐盟影響造成獨一無二的變動形態，否則我們無法從形態一致的後測指標去推論原因為何。有鑑於此，第三項準實驗設計採「單一群前測/後測設計」(the one group pretest-posttest design)。這個設計強調「刺激」前的測量觀察做為「刺激」後的對照組比較。以「歐洲化」研究為例，我們可觀察歐盟競爭政策尚未建立前各國產業的競爭狀況，以此做為前測觀察點。再觀察各國產業在歐盟競爭政策運作後的競爭狀況。我們也可以觀察尚未加入歐盟前，候選國的產業競爭狀況為前測點，再比較其加入後的競爭狀況。或為求慎重，我們可攝取兩個前測點(double pretest design)來與後測觀察比較。此乃第四項準實驗設計，旨在緩解前後測時點間所可能產生的內部效度偏差，如受測者自我調適或依前測改變行為等。Shadish, Cook 和 Campbell 進一步說明「非等同依變項之前後測設計」、「解除刺激設計」(removed-treatment design)、和「重複刺激設計」(repeated-treatment design)等五、六、七項準實驗設計。基本上，「非等同依變項」與原依變項都來自同一母體，例如習慣法傳統。

但習慣法傳統的 (A) 判例法制度與 (B) 司法審查制度受歐盟法律體系的影響卻不一致。假定 (A) 是原依變項，(B) 是非等同依變項，則經過前後測量，我們應發現 (A) 受歐盟法律體系影響而變動，(B) 則無變動，但卻與潛在危及內部效度的因素有共變性 (如美國司法審查制度影響)。由此設計我們可以控制潛在干擾因素的影響力。至於解除和重複刺激的準實驗設計則是操縱「刺激」的有無來觀察不同時點之依變項的變化。控制刺激的有無或頻率在「歐洲化」研究較難達成，故存而不論。

適當的準實驗設計有助於我們釐清歐洲化的因果關係，不過在概念層次上，筆者仍須說明圖 6 兩主要變項間的因果機制。承襲自 Risse, Cowles 和 Caporaso (2001) 的分析架構，研究「歐洲化」的學者大多能接受「契合度」的概念，也理解「歐洲化」影響力可以透過理性誘因或和社會學習來促使國內體制和政策改變，並能區別不同幅度的調適過程及相關中介因素。不過，筆者在圖 6 有進一步釐清這些概念。首先，筆者省略 Risse 等人建議的中介變數，並將其歸類至國內體制政策的指標或誘因機制。例如多重否決點的存在與否與國內憲政制度有關，本身也可能是被「歐洲化」的對象。至於社會化或學習則是歐盟誘因結構的一環，不應視為中介變數。筆者認為，中介變數應與「歐洲化」依變項指標有所區隔，否則會造成因果關係的混淆。其次，歐洲及國家層次的客觀結構契合度看似一個有效的中介變數，實際上卻受到決策者的主觀認知和偏好所左右。假定歐盟在某政策領域採半多元主義 (semi-pluralism) 的治理模式，但德國在該領域卻採組合主義 (corporatism)。兩者的治理結構不契合，因此預測德國「感受」到調適壓力。客觀結構愈不契合，會員國主觀感受壓力愈大，但最終是由會員國決策者的壓力感受和其對調適方式的認知來決定如何調適。雖然研究者可以客觀區別因

治理模式不契合所必須做的調適幅度 (Schmidt, 2006), 但最後是否及如何調整國內體制和政策, 則由決策者主觀判定, 有時甚至會發生政策已調適, 但卻無歐盟壓力的現象 (Zahariadis, 2005)。

有鑑於「契合度」概念可能完全取決於決策者的主觀認知, 故 Mastenbroek 和 Kaeding (2006) 主張將其排除在理論建構外。換言之, 「契合度」既非「歐洲化」的充分條件 (Risse 等人皆承認), 也不是其必要條件。筆者在圖 6 保留客觀結構契合度變項, 是因為操作上若決策者主觀認知及偏好不可得, 則「契合度」仍是一個可操作的中介變數。況且嚴格檢證「契合度」所發展出來的假設, 總比事後以決策者主觀認知和偏好來合理化證據不符理論預期的現象, 更有助於「歐洲化」的知識累積及因果關係的釐清。

伍、結論：從理論尋根談未來「歐洲化」課題之新研究取向

「歐洲化」名詞廣為學界引用乃是一九九〇年代後期之事, 但是「歐洲化」的研究課題早被歐盟研究先驅者所注意。早年功能主義與新功能主義的辯論已提及民族國家概念是否過氣過時了 (Haas, 1958; Hoffmann, 1966)。晚近, 自由派政府間主義者強調國內社會偏好的匯集對歐洲統合之影響 (Moravcsik, 1998)。同時也辯論到底歐盟運作是強化還是削弱會員國中央政府的權力 (Moravcsik, 1994)。多層級治理理論的研究者加入論戰, 辯稱歐盟多層級治理體系已逐漸掏空會員國中央政府的權責, 其部分權力已轉移至歐盟超國家組織、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組織 (Marks, Hooghe, & Blank, 1996)。另外, 歷史制度主義者則提出, 雖然會員國在 T_0 時點決定分攤主權, 但因其短視無法預料制度演化所產生的「非意料結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到了 T_n 時點, 歐盟制度因「路徑依賴」

(path dependence) 演進，產生極大的路徑變動成本或退出成本，於是會員國所分攤的主權實際上是無法回收的 (Pierson, 1996)。這樣的學術論戰其實已觸及「歐洲化」的研究旨趣，即國內體制和政策之變動。因此，我們可以說「歐洲化」乃「歐洲統合」研究的「二次形象反轉」(Second Image Reversed) (Gouvrevitch, 1978)。

所謂「二次形象」(second image) 乃 Kenneth Waltz 所提出，旨在探討國內結構和因素如何影響國際政治和體系 (Waltz, 1975)。Gouvrevitch 認為將國內結構視為自變數去解釋國際政治及體系是不恰當的，因為國際政治及體系本身可能對國內結構具有獨立的影響力。換言之，當我們欲使用國內結構去解釋外交政策時，應先理解這國內結構本身有多少是來自國際體系的影響力所造成的 (Gouvrevitch, 1978: 882)。依其見解，國際體系中的權力分配，以及經濟活動中的財富分配乃塑造國內結構的兩項主要因素。前者指戰爭所造成的國家在國際政治體系中的權力分配，後者指貿易所引起的國家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財富分配。Gouvrevitch 認為戰爭和貿易本身便會影響國內結構的形成，特別是對國內結構中的政權樣態 (regime type) 及聯合形態 (coalition pattern) 的衝擊應受重視。雖然國際關係學者常用政權和聯合形態來解釋外交政策，但 Gouvrevitch 認為國內結構中的政權和聯合形態不是獨立的自變數，它們與國際體系呈現交互作用。在此情況下，研究國際政治不能忽略由外而內 (outside in) 的研究設計。依 Gouvrevitch 之見，國際體系中戰爭和貿易所形成的國家權力及財富分配才是解釋國內結構中的政權和聯合樣態的主要因素。這便是「二次形象反轉」理論。運用到「歐洲化」的研究上，「二次形象反轉」理論是指歐洲統合或歐盟治理體系對國內體制和政策之衝擊。因此，「二次形象反轉」提供「歐洲化」研究一項很好的理論基礎。

一、「歐洲化」研究之兩種理論基礎

既然「歐洲化」研究旨趣在於國內體制及政策的變動，它應與歐洲統合研究有所區隔。尤其是在研究方法上學者逐漸採用比較政治學的方法取代國際關係研究方法 (Hix, 1994)。此外，因為歐洲化的研究旨趣在於國內體制和政策變動，故它與新制度主義的關聯密切。尤其是新制度主義中的「理性抉擇」制度論和「社會學 / 建構主義」制度論，亦可成為歐洲化研究的理論基礎。所謂「理性抉擇制度論」中之理性 (rationality) 是指行動者之手段與目的間具有最適相應 (optimal correspondence) 關係 (Tsebelis, 1990: 18)。操作上，研究者常假定行動者是自私自利地去尋求本身效用 (utility) 之極大化。但自私自利並非理性抉擇之前提，亦非「理性」之充要條件。從分析的角度，理性抉擇要求行動者之偏好、抉擇與結果具一致性 (consistency) 罷了。雖然「理性抉擇」乃個別行動者所為，但是理性抉擇理論卻特別重視行動者的外在限制，即制度。這是因為外在制度 (或遊戲規則) 會決定行動者之選項及其行為，並進而產生政治及社會後果 (Tsebelis, 1990: 40)。所以「制度」乃是理性抉擇理論之首要分析對象。然而，在此理論架構下，制度只會形塑行動者之行動選項，但卻不會改變其既有偏好。行動者之偏好被假設為外生且固定。行動者依其偏好並在制度限制下採行最佳行動選項以求本身效用之極大化。這套理論運用到「歐洲化」研究上所欲展現的是國內政策制定者如何面臨歐洲整合 / 歐盟治理體系的壓力，依其既有偏好，並在現有體制的誘因結構中，尋求一最佳的調適方案，進而造成國內體制和政策之變動。如本文第三節指出，歐洲統合或歐盟治理體系往往會改變會員國國內行動者之政治機會結構及行動能力，進而使其採行理性抉擇去改變現有國內體制或政策。例如歐盟競爭政策賦予德國民營銀行向執委會告發其境內不公

平競爭情事，導致執委會調查並施壓德國政府廢止國家提供公營銀行債性擔保制度。在此理論架構下，德國銀行債信擔保制度之「歐洲化」乃由行動者（即民營銀行公會）之理性決策行動所造成。

然而社會建構論 (social constructivism) 卻對上述理性決策制度論的解釋有所批評 (Wendt, 1998)。社會建構論者認為不論是國際體系或歐洲統合，皆是「社會建構的現實」(social constructed reality)。行動者絕非處於虛無真空的決策環境中，針對可能的選項進行理性計算並採行其中之最佳者為之 (Wendt & Fearon, 2001)。相反地，歐洲統合是一種「社會過程」(social process)，其間會員國和公民的偏好與認同並非外生固定的，而是透過社會化過程不斷地自我反思調整，進而「發現」共同的利益和採取共同的行動 (Christiansen, Jorgensen, & Wiener, 1999)。社會建構論強調歐洲統合或歐盟整體的「社會理解」(social understanding) 和語意體系 (system of meanings) 對會員國及其公民的自我認同、利益認知和具體行為之影響。行動者不但因制度限制而選擇最佳行動方案，而且可能因浸淫在歐盟治理體系或歐洲統合的社會化過程中而改變其偏好與利益之界定，甚至改變自我認同。依此理論，「歐洲化」造成會員國國內體制和政策之變動乃是因為會員國及其公民根本改變其偏好和利益的界定，並認知到歐盟與會員國乃相互建構之現實 (Giddens, 1979)。在此相互建構現實中，意念 (idea)、論述 (discourse) 及溝通行動 (communicative action) 實扮演重要角色。例如歐洲統合過程所出現的特殊語彙，像是「支柱架構」(pillar structure)、「多速歐洲」(multi-speed Europe)、「民主赤字」(democracy deficit)、「輔助原則」(subsidiarity) 等，經過歐洲政治菁英的長期溝通與論述，已逐漸改變國家利益和國族認同的界定，並影響歐洲各國政體之建構及文化認同之塑造 (Christiansen,

Jorgensen, & Wiener, 1999: 540)。依社會建構論之脈絡，我們應去「理解」(understand) 而非解釋「歐洲化」之現象。而欲理解「歐洲化」，則研究者應格外重視會員國及其公民所處特殊環境中的社會化過程，及其造成的偏好、文化、習俗、認同之變遷。本文第三節舉例指出歐盟的購併控制規定對會員國並無強制拘束力。然而，一旦歐盟在此領域建立政策權責，則其政策形象 (policy image) 常使其內涵具有正當性。又透過歐盟官員與英國業務主管之密切互動，經相互溝通學習後，英國官員竟然內化歐盟購併規定之精要，因而改變其政策偏好，使英國購併政策與歐盟建制趨同。

以上理性抉擇制度論和社會建構論均曾被歐洲化研究者所運用。反而令人意外的是歷史制度主義卻較少被引用 (Bulmer, 2007: 56)。由於「歐洲化」研究體制和政策之變動必然會涉及時間面向。而歷史制度主義正是強調事件發生的時間序列，用以釐清因果關係。例如我們應區隔歐洲化發生的時點 (time)；時機 (timing)，即事件發生的順序；以及節奏 (tempo)，即事件發生的速度。同時我們也應重視「歐洲化」的路徑依賴，以判斷國內體制和政策變動的方向。由於「歐洲化」涉及時間序列的事件變動，方法上應儘可能採用「過程追蹤」、「準實驗設計」、或「違反事實推論」(counterfactual reasoning) 等來釐清因果關係 (Haverland, 2007: 62-63)。例如，有關歐洲化的「違反事實推論」是假定歐洲統合不存在，則國內體制和政策應如何發展。這是一種邏輯思考實驗 (thought experiment)。為不致造成無限的臆測，通常「違反事實推論」應將重寫歷史的部分降到最低，而且應將思考實驗之變動部分明白標示，並將假設情境 (scenario) 之條件合理化 (Haverland, 2005: 4-6)。除了「過程追蹤」被廣為使用外，「準實驗設計」和「違反事實推論」應用到「歐洲化」研究上仍屬少數，應有發展的潛力。

二、「歐洲化」研究途徑之未來走向

綜合以上討論，「歐洲化」課題之新研究取向為何呢？本文從方法論角度出發，回顧目前研究方法具代表性的「歐洲化」著作。筆者發現其實「歐洲化」研究早有理論根源可尋。它與歐洲統合理論有相當的淵源。若從學門來看，比較政治學及政治社會學的研究方法逐漸被引進到歐洲化的研究。國際關係在歐洲統合的研究成果則成爲必要的背景知識。又因「歐洲化」的研究旨趣在國內體制和政策變動，於是新制度主義成爲「歐洲化」研究的主流。從研究方法來看，絕大部分的「歐洲化」著作採用個案分析法及比較研究法。晚近隨著研究議題擴充及大量資料的蒐集，量化統計模型逐漸爲人所用，但仍屬少數。雖然「歐洲化」研究取向趨於多元，也愈加嚴謹，但整個研究領域仍有諸多研究方法上的問題尙待解決，這些問題構成了「歐洲化」研究之限制。

筆者認爲「歐洲化」的定義鬆散不明，概念混淆不清，因果關係甚難辨別，操作性指標之效度不夠，相關變數多於研究案例，研究方法受限於案例而保守，研究成果缺乏對話或無法被重複檢證，都限制「歐洲化」的研究發展。本文一開始便探究歐洲化之定義。雖然其廣義定義可被接受，但因過於鬆散，而導致研究議題不斷擴充，造成任何東西都可被「歐洲化」的印象。其次，若將「歐洲化」定義成歐洲統合或歐盟治理體系對國內體制和政治所造成之衝擊及調適過程，則依變項與自變項看似較爲明確。可是其中所涉及的概念仍相當模糊，需以概念化指標來進一步限縮。例如，若將「調適過程」當做依變項，則因爲「過程」是一連續性的概念，於是任一調適樣態皆無法有效代表「過程」。除非我們能夠完整地描述「調適過程」，否則任何調適樣態皆可被視爲或不被視爲「歐洲化」之證據。更嚴重的問題是若將「歐洲化」界定成歐洲與國家層次間變

數的雙向互動過程，則我們在經驗上要釐清「歐洲化」的淨效果會變得更困難。尤其是經由幾回合的雙向互動，「歐洲化」的淨效果可能減少或增加。然而，目前研究鮮少討論「歐洲化」的「次級衝擊」或「淨衝擊」。

當然定義鬆散不明的好處是使歐洲化研究議題可以快速擴張。但是缺點是從定義所衍生的概念變得難以測量，又概念與概念間的因果關係也難以釐清。在「歐洲化」概念的釐清努力上，過去研究採用多樣的操作性定義和概念化指標，但因定義和指標過於龐雜，而且甚少明確說明其操作化的正當性，故概念指標之加總是否可以代表歐洲化現象則令人懷疑。有鑑於此，研究者應更重視概念化和操作化指標的建立，並應深入討論指標與概念之間的效度和信度，以確保經驗觀察案例確實可以指涉「歐洲化」現象。其次，過去研究對於「變動」和「調適」的概念化指標仍不明確。雖然有些學者試圖設定「變動」幅度的操作性指標和「調適過程」的概念化模型，但是變動幅度指標間的關聯性並未明確化。又概念化的「調適過程」之因果路徑也未釐清，故過去研究發現是否可以證實或推翻「歐洲化」現象的存在，也多所爭議。所以後學者可能必須在「歐洲化」的因果關係的理論建構上多下功夫。最後，過去研究雖然針對依變項，即國內體制和政策變動或調適過程的操作化多所著墨，但對於自變項，即歐洲統合或歐盟治理體系的操作化則較少討論。研究者要不認為自變項是顯而易見的背景概念，就是以特殊操作性定義為之。例如，會員國履行轉化歐盟法規的程度，常被視為「歐洲化」的依變項，而其操作化指標是未履行 / 不轉化歐盟法規的頻率。但歐盟法規的存在與否，所造成的調適壓力大小（即自變項指標）似乎未曾也不需被正當化，因為它從定義而來故顯而易見。可是歐盟法規存歿或造成的壓力大小，也可能不完全由歐盟層次因素

所決定，因此它是否可以測量「歐洲化」概念則應予合理化。在此，研究者應特別重視「歐洲化」的自變項之概念化和操作化的合理性。

在研究設計上，本文評析目前「歐洲化」研究慣常使用的個案分析法和有限案例比較方法，以及最近流行的統計量化研究之優缺點，並指出其未來可改進之處。簡單來說，早期的個案分析法對於釐清概念，發掘相關變數，及擴展研究子題有其卓越的貢獻。而且個案分析著重個案的特殊時空背景的描述，對於釐清歐洲化的因果關係有其優勢。其缺點是無法將個案發現通則化，也甚難重複檢證其發現的正確性。有鑑於此，愈來愈多的「歐洲化」研究採用有限案例比較分析法。尤其是嚴謹的比較方法常可透過研究案例的選擇(如最大相似法或最大差異法)來控制其他干擾因素的變異量，進而達到初步檢證假設的目的。而且隨著比較案例的增加，研究成果通則化的可信度亦增加。不但如此，比較方法在擴展研究子題，發掘相關變數，和提出相關假設上亦有其優勢，因為其所發現之變數和假設已在多案中出現，故其內在因果機制多少已可確立，只待大量案例加以否證。

比較方法仍有其限制。其一是一旦比較案例過多，研究者常會混淆因果關係，且無法控制干擾因素。其二是比較對象若無理論指引，則常淪為為比較而比較，所得之結果只是徒增變數的數目罷了。是此，後學者應強化理論來指引其比較方法的設計，特別應慎選比較案例來控制相關干擾因素，並適切利用外部樣本，來釐清自變項與依變項之因果關係。最後，「歐洲化」研究反映在統計量化研究設計上仍屬少數，但已逐漸為人所用。一則因為「歐洲化」研究已逐漸成熟，不但相關假設變數繁多，就連研究子題也包羅萬象。可是對於諸多假設的檢證仍相當厥如。即使有些檢證假設的努力，但其發現仍屬初探建議性質。為了能有效檢證「歐洲化」的相

關假設，並控制其他干擾變數，研究者開始有系統地搜集大量資料，並以敘述統計或簡單統計模型來分析依變項和自變項間的相關性。本文所討論的量化研究大多採用敘述統計方式來呈現歐洲化與國內體制或政策變動的關係，也有使用相關分析和迴歸模型。但重點是量化統計方法仍受限於其樣本數目多寡。只要樣本數夠多，則統計方法可操作的空間較大，可控制的變數也較多。因此本文舉例介紹幾種增加樣本數的方法，並探討其優劣。眾所皆知，量化統計研究的好處是其研究成果之通則化程度高，又可被重複檢證，避免因操作不當而錯誤推論。而且因案例數量夠多，故在釐清因果關聯，控制干擾因素上有其優勢。但其缺點是這種橫斷時空的量化資料通常缺乏時空背景的特異性，也忽略情境 (context) 的特殊性，故對統計分析結果的詮釋常悖離歷史和地理情境。因此，量化統計研究者應時時警覺其研究成果的時空環境，避免過度詮釋其結果的通則性。

最後本文探索「歐洲化」研究的理論淵源。雖然與歐洲統合理論早有連結，但「歐洲化」研究更著重國內體制和政策之變動，因此有偏好新制度主義與比較政治之嫌。然而，比較遺憾的是，歷史制度主義及動態功能整合模型仍未被廣為採用。上述兩種研究取向有其理論建構和實證操作的優勢。前者特別重視時間序列的制度變動和演化，後者則重視因果互置的動態演化過程。兩種研究取向與「歐洲化」研究旨趣（即因歐洲統合 / 歐盟所造成的國內體制之變動與調適）完全契合，亦有操作的可能性，故應該視為未來「歐洲化」課題的新研究取向。

參考文獻

- Babbie, E. R. (1979).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Belmont, CA: Wadsworth.
- Beyers, J., & Kerremans, B. (2007). Critical resource dependencies and the Europeanization of domestic interest groups.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4, 3: 460-481.
- Bomberg, E., & Peterson, J. (2000). Policy transfer and Europeanization: Passing the Heineken test? *Europeanization Online Papers*, 2. Retrieved September 10, 2008, from <http://www.qub.ac.uk/schools/SchoolofPoliticsInternationalStudiesandPhilosophy/FileStore/EuropeanisationFiles/Filetoupload,38445,en.pdf>
- Börzel, T. A. (2001). Europeanization and territorial institutional change: Toward cooperative regionalism? In M. G. Cowles, J. Caporaso, & T. Risse (Eds.), *Transforming Europe: 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 (pp. 137-158).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Börzel, T. A. (2002). *States and regions in the European Union: Institutional adaptation in Germany and Spai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örzel, T. A., & Risse, T. (2003). Conceptualizing the domestic impact of Europe. In K. Featherstone & C. M. Radaelli (Eds.), *The politics of Europeanization* (pp. 57-80).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ugdahn, S. (2005). Of 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rective in Ireland, 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2, 1: 177-199.
- Bulmer, S. (2007). Theorizing Europeanization. In P. Graziano & M. P. Vink (Eds.), *Europeanization: New research agendas* (pp. 46-58).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 Bulmer, S., & Burch, M. (2001). The “Europeanisation” of central government: The UK and Germany i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t perspective. In G. Schneider & M. Aspinwall (Eds.), *The rules of integration* (pp. 73-96). 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 Press.
- Burch, M., & Gomez, R. (2003, May 2). *Europeanization and the English regions*. Paper presented at ESRC/UACES Seminars on the Europeanization of British Politics and Policy,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UK.
- Caporaso, J., & Jupille, J. (2001). The Europeanization of gender equality policy and domestic structural change. In M. G. Cowles, J. Caporaso, & T. Risse (Eds.), *Transforming Europe: 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 (pp. 21-43).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Carter, E., Luther, K. P., & Poguntke, T. (2007).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internal party dynamics. In T. Poguntke, N. Aylott, E. Carter, R. Ladrech, & K. R. Luther (Eds.), *The Europeanization of national political parties* (pp. 1-27). London: Routledge.
- Checkel, J. T. (2001). The Europeanization of citizenship? In M. G. Cowles, J. Caporaso, & T. Risse (Eds.), *Transforming Europe: 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 (pp. 180-197).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Christiansen, T. K., Jørgensen, E., & Wiener, A. (1999).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urope.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6, 4: 528-544.
- Conant, L. (2001). Europeanization and the courts: Variable patterns of adaptation among national judiciaries. In M. G. Cowles, J. Caporaso, & T. Risse (Eds.), *Transforming Europe: 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 (pp. 97-115).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Cowles, M. G. (2001). The transatlantic business dialogue and domestic business—Government relations. In M. G. Cowles, J. Caporaso, & T. Risse (Eds.), *Transforming Europe: 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 (pp. 159-179).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Cowles, M. G., & Risse, T. (2001). Transforming Europe: Conclusions. In M. G. Cowles, J. Caporaso, & T. Risse (Eds.), *Transforming Europe: 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 (pp. 217-238).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Cowles, M. G., Caporaso, J., & Risse, T. (Eds.). (2001). *Transforming Europe: 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De Rooij, R. (2002). The impact of the European Union on local government in the Netherlands.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7, 2: 447-467.
- Deutsch, K. W. (1957).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New York: Greenwood.
- Diamond, L. (1999).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 consolidation*. Baltimore, MD: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Dover, R. (2007). *Europeanization of British defence policy*. Aldershot, UK: Ashgate.
- Dyson, K. A. (1980). *The state tradition in Western Europe: A study of an ideal and institution*. Oxford, UK: Martin Robertson.
- Fleurke, F., & Willemse, R. (2007). Effects of the European Union on sub-national decision-making: Enhancement or constriction?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29, 1: 69-88.
- Giddens, A. (1979).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iddens, A. (2003). *Runaway world: How globaliz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 New York: Routledge.
- Glenn, J. K. (2004). From nation-states to member states: Accession negotiations as an instrument of Europeanization.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2: 3-28.
- Goetz, K. H., & Hix, S. (2001). *Europeanized politics?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national political systems*. London: Frank Cass.
- Gouvrevitch, P. A. (1978).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2, 4: 881-912.
- Graziano, P., & Vink, M. P. (2007). Challenges of a new research agenda. In P. Graziano & M. P. Vink (Eds.), *Europeanization: New research agendas* (pp. 3-22).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 Grossman, E. (2006). Europeanization as an interactive process: German public banks meet EU state aid policy. *Journal of Common*

- Market Studies*, 44, 2: 325-348.
- Haas, E. (1958). *The uniting of Europe: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forces, 1950-1957*.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cking, I. (1999).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all, P. A., & Taylor, R. C. R. (1996).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 *Political Studies*, 44: 952-973.
- Haverland, M. (2005). Does the EU cause domestic developments? The problem of case selection in Europeanization research.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 9, 2. Retrieved September 10, 2008, from <http://eiop.or.at/eiop/pdf/2005-002.pdf>
- Haverland, M. (2007). Methodology. In P. Graziano & M. P. Vink (Eds.), *Europeanization: New research agendas* (pp. 59-70).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 Hay, C., & Rosamond, B. (2002). Globalization,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economic imperatives.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9, 2: 147-167.
- Hennis, M. (2001). Europea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The missing link.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39, 5: 829-850.
- Héritier, A. (1995). "Leaders" and "Laggards" in European clean air policy. In F. van Waarden & B. Unger (Eds.), *Convergence or diversity?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economic policy response* (pp. 278-305). Avebury, UK: Aldershot.
- Héritier, A. (2001). Differential Europe: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responses to community policy. In M. G. Cowles, J. Caporaso, & T. Risse (Eds.), *Transforming Europe: 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 (pp. 44-59).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Héritier, A., & Knill, C. (2001). Differential responses to European policies: A comparison. In A. Héritier, D. Kerwer, C. Knill, D. Lehmkuhl, M. Teutsch, & A.-C. Douillet (Eds.), *Differential Europe: The European Union impact on national policymaking* (pp. 257-294). Boulder, CO: Rowman & Littlefield.
- Hix, S. (1994). The study of European: The challenge to comparative politics. *West European Politics*, 17, 1: 1-30.
- Hoffmann, S. (1966). Obsolete on obsolete: The fate of nation-state

- and the sase of western Europe. *Daedalus*, 95: 962-915.
- Huntington, S. P. (1993).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Oklahoma, OK: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Jordan, A., Wurzel, R., Zito, A., & Brückner, L. (2003). Policy innovation or “muddling through”? “New” 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ruments in the UK. *Environmental Politics*, 12, 1: 179-198.
- Kallestrup, M. (2002). Europeanisation as a discourse: Domestic policy legitimization through the articulation of a ‘need for adaptation’.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17, 2: 110-124.
- Knill, C. (2001). *The Europeanization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on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nill, C., & Lehmkuhl, D. (1999). How Europe matters: Different mechanism of Europeanization.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 3, 7: 1-19.
- Knill, C., & Lehmkuhl, D. (2002). The national impact of European Union regulatory policy: Three Europeanization mechanism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1, 2: 255-280.
- Knill, C., & Lenschow, A. (2001). Adjusting to EU environmental policy: Change and persistence of domestic administrations. In M. G. Cowles, J. Caporaso, & T. Risse (Eds.), *Transforming Europe: 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 (pp. 116-136).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ohler-Koch, B., & Eising, R. (Eds.). (1999).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London: Routledge.
- Ladrech, R. (1994). Europeanization of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s: The case of France.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32, 1: 69-88.
- Lawton, T. (1999). Governing the skies: Conditions for the Europeanization of airline policy.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19, 1: 91-112.
- Levi-Faur, D. (2004). On the “net impact” of Europeanization: The EU’s telecoms and electricity regimes between the global and the national.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7, 1: 3-29.
- Lijphart, A. (1971).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comparative method.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5: 682-693.
- Linz, J. J., & Stephan, A. (1996).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Lodge, M. (2002). Varieties of Europeanisation and the national regulatory state.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17, 2: 43-67.
- Major, C. (2005). Europeanization and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Undermining or rescuing the nation state? *Politics*, 25, 3: 175-190.
- March, J. G., & Olsen, J. P. (1998). The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ord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2, 4: 943-969.
- Marks, G., Hooghe, L., & Blank, K. (1996). European integration from the 1980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34, 3: 341-378.
- Mastenbroek, E., & Kaeding, M. (2006). Europeanization beyond the goodness of fit: Domestic politics in the forefront.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4: 331-354.
- McGowan, L. (2005). Europeanization unleashed and rebounding: Assess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EU cartel policy.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2, 6: 986-1004.
- Mittag, J., & Wessels, W. (2003). The "one" and the "fifteen"? The member states between procedural adaptation and structural revolution. In W. Wessels, A. Maurer, & J. Mittag (Eds.), *Fifteen into one?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member states* (pp. 413-454). 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Montpetit, E. (2000). 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 Europ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French environmental policy for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7, 4: 576-592.
- Moravcsik, A. (1994). *Why the European community strengthens the stat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orking Paper No. 52).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
- Moravcsik, A. (1998). *The choice for Europ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Olsen, J. (2002). The many faces of Europeanizati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40, 5: 921-952.
- Panke, D. (2007).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as an agent of Europeanization? Restoring compliance with EU law.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4, 6: 847-866.
- Pennings, P. (2006).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Europeanization of national party manifestos, 1990-2003. *European Union Politics*, 7, 2: 257-270.
- Pierson, P. (1996). The path to European integration: A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analysi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cience*, 29, 2: 123-163.
- Przeworski, A., & Teune, H. (1970).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social inquiry*. New York: John Wiley.
- Radaelli, C. M. (2000). Whither Europeanization? Concept stretching and substantive change.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 4, 8: 1-25. Retrieved September 10, 2008, from <http://eiop.or.at/eiop/texte/2000-008.htm>
- Radaelli, C. M. (2003). The Europeanization of public policy. In K. Featherstone & C. M. Radaelli, *The politics of Europeanization* (pp. 27-56).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adaelli, C. M., & Pasquier, R. (2007). Conceptual issues. In P. Graziano & M. P. Vink (Eds.), *Europeanization: New research agendas* (pp. 35-45).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 Risse, T. (2001). A European identity? Europeanization and the revolution of nation-state identities. In M. G. Cowles, J. Caporaso, & T. Risse (Eds.), *Transforming Europe: 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 (pp. 198-216).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Risse, T., Cowles, M. G., & Caporaso, J. (2001). 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 Introduction. In M. G. Cowles, J. Caporaso, & T. Risse (Eds.), *Transforming Europe: 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 (pp. 1-20).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andholtz, W., & Stone Sweet, A. (1998).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supranational governa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artori, G. (1991). Comparing and miscomparing. *Journal of Theo-*

- retical Politics*, 3, 3: 243-257.
- Sbragia, A. (2001). Italy pays for Europe: Political leadership, political choice, and institutional adaptation. In M. G. Cowles, J. Caporaso, & T. Risse (Eds.), *Transforming Europe: 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 (pp. 79-96).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chimmelfennig, F., & Sedelmeier, U. (Eds.). (2005). *The Europeanization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chmidt, V. A. (2006). Procedural democracy in the EU: The Europeanization of national and sectoral policy making process.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3, 5: 670-691.
- Schneider, V., & Häge, F. M. (2008). Europeanization and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5, 1: 1-19.
- Shadish, W. R., Cook, T. D., & Campbell, D. T. (2002). *Experimental and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s for generalized causal inferenc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Stone Sweet, A., & Brunell, T. (1998). Constructing a supranational constitution: Dispute resolution and 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2, 1: 63-82.
- Stone Sweet, A., Sandholtz, W., & Fligstein, N. (2001).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Europe*. Oxford,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verdrup, U. (2004). Compliance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in the European Union: Nordic exceptionalism.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27, 1: 23-43.
- Tsebelis, G. (1990). *Nested game: Rational choice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Verdier, D., & Breen, R. (2001). Europea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Politics against markets in the European Un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4, 3: 227-262.
- Wallace, H. (2000). Europeanisation and globalisation: Complimentary or contradictory trends? *New Political Economy*, 5, 3: 369-382.
- Walters, M. (2001). *Globalization 2nd*. London: Routledge.
- Waltz, K. (1975).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F. Greenstein & N. Polsby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8. Inter-*

- national relations* (pp. 1-86). Menlo Park, CA: Addison-Wesley.
- Weber, S. (2001). *Globalization and the European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endt, A. (1998). On constitution and caus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4: 101-118.
- Wendt, A., & Fearon, J. (2001). Rationalism vs. constructivism: A skeptical view. In W. Carlsnaes, T. Risse, & B.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 Wessels, W., Maurer, A., & Mittag, J. (2003). *Fifteen into one?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member states*. 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Wong, R. (2006). *The Europeanization of French foreign policy: France and the EU in East Asia*.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 Zahariadis, N. (2005). Adaptation with pressure? European legislation and British merger policy. *The Policy Studies Journal*, 33, 4: 657-674.
- Zeff, E. E., & Pirro, E. B. (2001).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member state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Europeanization —An Evaluation of Research Approaches

David Wei-Feng Huang

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No. 128, Sec. 2, Academia Rd., Taipei 11529, Taiwan
E-mail: wfhuang@gate.sinica.edu.tw

Abstract

The study of Europeanization has been popular since the late 1990s. However, the core disputes of Europeanization remain unresolved, the definition of the field is much contested, and the causality of the process of Europeanization has not yet been clarified. This paper offers a methodological assessment of typical approaches currently employed in Europeanization studies, examining their merits and limitations based on their conceptualization, hypotheses,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nd empirical analyses. Because Europeanization focuses on changes (or adaptations) in domestic polity and policy, the author finds that most researchers prefer approaches derived from new institutionalism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indeed, case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methods dominate the research field of Europeanization and there have been very few quantitative studies aimed at verifying various causal hypotheses of Europeanization. Indeed, the most urgent research task in the field is to clarify the causal mechanisms of Europeanization.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and a dynamic functional integration model be used to clarify time-sequences and causal reversals of Europeanization.

Key Words: Europeanization, European integration, new institutionalism, comparative methods,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s